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既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又是控制南北运输主要干线津浦铁路和近海交通的要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2年4月,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刘少奇同志从新四军回延安途经山东根据地。刘少奇同志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细致了解和研究山东党政军工作情况,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主要干部的配备等问题。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从而使山东根据地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转变,山东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详见《刘少奇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

1952年,全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中共新海连市委组织调查组到云台区朝阳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查,王新宇时任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工作组组长。在她的领导下,一篇名为《社越大优越性越大》的调查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选中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该文添加了按语。以此为起点,王新宇开启了新的政治生命。长期在徐州地委工作、担任过王新宇秘书的李鸿民撰写的《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工作组组长王新宇的跌宕人生》,带我们走近王新宇。

日前,《灌南县志(1984~2005)》正式出版面世。该志横陈百科、涵盖百业,特点鲜明:纵述始末,主体记述上到1984年,下限止于2005年;众手成志,全县上百个单位超百名人员参与其中;体量庞大,全志共34编约22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作为全市第一家正式出版的县志,该志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编纂过程具有代表性,本

期的“读史评志”栏目,朱月潭的《信史良志 功莫大焉——〈灌南县志(1984~2005)〉读后》、姜龙才的《一部继承创新的上乘之作——读〈灌南县志(1984~2005)〉有感》对该志进行了科学的点评,韩翠林的《精品良志磨砺出——〈灌南县志〉编修纪略》则对该志的编纂过程进行了回顾。详见内文。

书的早期形态,是以写刻、誊抄的物质形态保留、传播、交流的。在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时期,结绳、堆石、刻画、悬挂饰物等是主要的表达手段。连云港的山石上保存有5000多年前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画面,被考古学界称为“东方天书”,是江苏唯一现存的岩画遗迹。无独有偶,连云港这块文化沃土,也有2000年前的简牍——花果山出土的汉代法律文书,东海出土的郡级行政文书以及帛书《神鸟赋》……及至明清,《镜花缘》《西游记》两部旷世经典版权、著作权的历史印痕,将是中国出版史不可或缺的章节。详见我市知名地方文史专家李洪甫研究员的文章《中国出版史上的精彩一页——古海州的写抄、刻印和出版》。

煎饼,发源于山东沂蒙山区,盛行于鲁南、鲁中、鲁西及苏北一带。赣榆地处苏鲁交界,也是煎饼的主产区之一。作为赣榆民间的主食,煎饼美味可口,便于携带储存,因此煎饼又是赣榆人外出旅行、出差办公、打工求学首选的自带食品。葛永明同志撰写的《话说煎饼》从煎饼制作的原料、煎饼的吃法、煎饼的历史、煎饼的制作工具、歌咏煎饼的诗文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尤其突出了抗战时期,山东抗日军民靠吃煎饼、喝糊涂,用步枪和地雷支撑了敌后抗战,并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胜利这段历史。详见内文。

1



连云港史志

LIAN YUNGAN SHI ZHI



◎ 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工作组组长王新宇的跌宕人生
◎ 中国出版史上的精彩一页
——古海州的写抄、刻印和出版
◎ 明清时期海州书院兴起的成因初探
◎ 常被写错的几个历史人物姓名
◎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八)

2016/05

第5期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臻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 苏中保

副主任: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一平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刘鹏 邱仕明
张再楼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编: 苏中保

副主编: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 张骏鹏

目

党史回眸

- 04 刘少奇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 / 史轩
07 西朱范村爱民井 / 王宗富

人物春秋

- 09 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工作组组长王新宇的跌宕人生 / 李鸿民
12 汤若瑜——汤沟女性的骄傲 / 陈娟娟
14 鲜为人知的音乐大师谢绍曾 / 张学贤

读史评志

- 17 信史良志 功莫大焉
——《灌南县志(1984~2005)》读后 / 朱月潭
19 一部继承与创新的上乘之作
——读《灌南县志(1984~2005)》有感 / 姜龙才
21 精品良志磨砺出
——《灌南县志(1984~2005)》编修纪略 / 韩翠林

地方文化研究

- 23 中国出版史上的精彩一页
——古海州的写抄、刻印和出版 / 李洪甫
25 明清时期海州书院兴起的成因初探 / 宋继奎
29 常被写错的几个历史人物姓名 / 张卫怀
30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八) / 刘凤桂

往事追忆

- 32 港城首次表彰模范教职工
——从一张65年前的老照片说起 / 韩世泳



录

郁洲溯源

- 34 “郅子国”考 / 王 滨
38 西石岛上有渔家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七 / 伏广喜 闫祥富

史沟钩沉

- 41 东磊半块残碑谜团 / 刘洪雨

风物览胜

- 44 兴国禅寺 / 胡维仁
46 话说煎饼 / 葛永明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十二五”期间

推动港城经济发展十件大事

关于征集纪念中共江苏省委 成立 90 周年论文的通知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纪念中共江苏省委成立 90 周年,深化党的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江苏地方党史研究,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现向全市党史系统、党史专家及党史爱好者征集有关论文。

本次征文将结集成册,并遴选优秀论文报送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办的纪念中共江苏省委成立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具体事项详见连云港史志网(<http://www.lygsz.gov.cn>)。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连云港市中共党史学会

2016 年 10 月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 编:222006

网 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 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2016 年 10 月

2016 年第 5 期总第 107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刘少奇在山东 滨海抗日根据地

史 轩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既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又是控制南北运输主要干线津浦铁路和近海交通的要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从1937年10月起就大举侵入山东，1939年后，加强了对山东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扫荡”的次数和规模。日军大规模进攻，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41年到1942年，山东根据地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还在于山东根据地的工作存在着问题。首先是根据地的整个政治军事工作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山东分局，本应成为统筹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中心，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其主要原因，一是缺乏经验，二是多头领导，三是分局领导之间团结协助不够，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工作中没有很好配合。其次是工作中存在缺点错误。分局领导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认识不够清楚，一方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右倾的错误，对党的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贯彻不力，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足，在反磨擦斗争中又常常表现得被动和无计划，甚至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山区让给顽固派军队，因而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最好时机。另一方面，在处理内部问题上又犯有左倾的

错误。在党内和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中乱开斗争会，使一些党内同志和非党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锄奸政策带有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锄奸工作扩大化。同时，群众工作也没有深入，过去曾经蓬勃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也未能予以巩固。群众生活没有认真地改善，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减轻群众负担等中心任务被忽视。

针对山东根据地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事关重大，任务艰巨，便委托刘少奇在从新四军回延安的途中代表中央到山东解决问题。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苏北。4月上旬，到达山东分局和第115师所在地临沭县朱樊村（现东海县西朱范村）。

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山东党政军工作情况，连续找了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等几位主要领导分别进行长时间交谈。之后，刘少奇召集分局委员加上第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榘开了一次谈话会交换意见，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不久又召开了一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和主要干部的配备等问题。随后，在刘少奇的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山东分局召开了分局委



员会议,全面地总结了山东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为了帮助山东的干部统一认识、提高领导水平,从4月26日起,刘少奇还分期分批地、有针对性地向山东的高、中级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从而使山东根据地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转变。

第一,调整了根据地的党政军机构和领导班子,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

当时,山东根据地内部除了主要领导之间团结协作不好以外,地方与军队、八路军第115师与原有的地方武装山东纵队之间,均存在一定的隔膜。刘少奇到山东后,首先着手处理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经过同各方领导人的反复酝酿磋商,1942年4月,在刘少奇参加的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1)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分局,在分局下设一个军政委员会。(2)第115师师部、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由万余人缩减为3500余人,干部统一分配。(3)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第115师建制,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胶东第五旅为机动部队(该旅以后也拨归第115师)。(4)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分局副书记、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均驻第115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等一起办公。通过这些组织上的调整,增强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精简了机关,充实了部队,同敌后的战争环境比较适应了。同时,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办公,也密切了相互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二,系统地总结了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山东领导干部的认识。

刘少奇在详细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在高级干部会上就几年来的山东工作作了总结,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武装在山东的困难处境。当时山东境内共有日军3.3万人、伪

军8万多人,合计11万多人。这些日伪军占据着交通要道和政治经济中心,严密封锁津浦、胶济铁路,使我方大部队无法通过。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13万人,其中反共的有8万多人。山东八路军武装有11.1万人,其中主力部队5.5万人,但由于主力分散,处于对日对顽两面作战且被动应付的局面,使根据地得不到巩固,甚至面积还有缩小。从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来看,日伪占优势,国民党次之,而我方则居于第三的劣势地位。在对客观情况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刘少奇向山东的领导干部们指出:“目前山东敌友我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

对此种局面,当时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在认识上不够充分和统一,曾失掉了许多取得优势的历史先机。如第115师主力东征过津浦路很迟,过路以后又未能与山东纵队密切合作迅速争取优势;在反摩擦斗争中,打翻了很多敌人但全都没有打彻底。刘少奇惋惜地说:“过去有过不少的机会是可以利用,充分可能的取得对顽的优势,然而天赐之福,我们未享受到,确实有些可惜。”当然,面前的种种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刘少奇告诫山东领导同志,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局面遮住了眼光,一定要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他说:“第一,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最艰苦的两年,我们不要中途夭折了,无饭吃,吃草也要吃两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第二,要准备好我们一切的条件,调查研究好,干部训练好,经验教训总结好,根据地巩固好,充分准备好,就不会失去先机。在这两年中准备力量,以使两年后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不悲观,不失望,不放下旗帜,不放下武器,不垂头丧气,哪怕什么逆转到来,哪怕什么困难到来,这都是破晓前的黑暗,不久就要天光。”(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指示》,引自肖华1942年4月26日笔记)

刘少奇的指示统一了山东高级干部的认识,树立了对敌斗争的坚强信念,为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三,端正了党的工作路线,使山东根据地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首先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打开了新局面。抗战初期,山东分局在统一战线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领导上偏软,不够果敢有力。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重申了中央的指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则必须贯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强调党和军队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巩固联合,光联合不斗争,就会失去党和阶级的立场。”(转引自肖华《难忘的四个月》,《红旗》1981年第15期)刘少奇特别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方针,为的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壮大我们自己,削弱和打败敌人。我们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目的就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问题的中心则在于如何不断壮大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先把自己手中的革命的力量交给顽固派,去乞求和人家联合。所以,我们要坚决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要告诉顽固军,他们要是抗日,我们就愿意和他联合;他们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我们就一定不能允许。”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纠正了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错误,山东的整个对敌斗争形势迅速改观。一部分搞“曲线救国”、坚决反共的顽固派、投降派,在我自卫反击的铁拳下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与愿意抗日联共的地方实力派(即中间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合作。

其次是在群众运动方面打开了新局面。在刘少奇到达以前,群众工作在山东是最薄弱的一环。对此,刘少奇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的还是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为了搞好群众运动,刘少奇针对实际,

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山东分局领导提高了认识,并且很快行动起来:先后颁布了多个有关群众运动的文件,组织了两个共有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两县,朱瑞等领导干部带头下乡。刘少奇也亲自到一些村子了解减租减息运动的进展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并把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参加运动。这样,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山东根据地在开展党内整风、加强军事工作、总结锄奸工作经验教训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第四,帮助山东根据地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和各项任务。

在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和积极抓好当前工作的同时,刘少奇还从山东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和客观形势出发,帮助制定了山东的党和军队今后的任务。刘少奇分析说:“山东以后的发展,决定于今后三角斗争力量的对比,看谁指导得好,斗争得好,团结得好,同时还决定于国际国内大局面的变化对谁有利。”他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内国际的伟大事变。”为了完成这个总的任务,刘少奇还提出了六项具体任务。这些任务,后来被写进山东分局作出的《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中。这一纲领性文件对山东根据地胜利地度过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和以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于1942年8月初离开山东经河北、山西赴延安。刘少奇走后,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山东根据地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西朱范村爱民井

王宗富

东海县西朱范村有一口古井,名叫“爱民井”,井台四周由四块平滑呈长方形的巨石砌成。井很深,井台四周荒草萋萋。这口井,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探源这口古井,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这个西朱范村里当时出了一个名叫王得胜的官居一品、任过总兵之职的武将,这口井就是王得胜退下来之后在自己家乡大庄园的花园里雇人开掘的,挖之前还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看过水脉。挖成之后井底有多处泉眼,水脉旺盛,水尤清冽,水质甘甜。除了浇灌园中的花木之外,村里人还到这里挑水吃。因王得胜曾官居一品,令人羡慕,所以这口井被村里人称之为官井。因水甜味正,6月天气产妇喝了此井的生水都没有问题,一般人喝了更是全身通爽,村里人很少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故又被人们誉为益寿井。

可为什么又叫做“爱民井”?这还要多亏了陈士榘老将军1987年故地重游。

1987年春天,那时我在东海县南辰中学任教导主任,西朱范村属南辰乡管辖。4月份的一天,我和一位老师骑自行车去西朱范村家访。那天西朱范村犹如过节一样,街道净洁,彩旗招展,人们欢声笑语。听村里支部书记讲,是原来八路军115师的参谋长陈士榘来到这里,寻访当年战斗的足迹,并和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民兵进行座谈。11时左右,老将军在市、县领导的陪同下,和群众代表一起从村部大院里走出来,向村外走去。在村西小河西岸的一条南北方向的土路旁,老将军指着路西的大

片绿油油的麦地说,记得这里原来是清末一位大官僚家的庄园,那是好大的一片建筑啊!抗日战争爆发后,西朱范村东边的青口镇、沙河镇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遍地烽火,兵荒马乱,大官僚的后人已散去,人去楼空,庄园荒芜。1939年夜间驻海州的日本鬼子曾接连两次开着十几辆汽车,来王家庄园抢劫玉器珍宝、古玩字画、红木家具。被洗劫后的庄园更加凄凉、残破。1941年,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来到这里,村里才红火起来。

陈老将军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说,往南走不远应该还有一口古井吧,那口古井很出名哩!周围群众都笑了,说不错啊,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那是王得胜家花园中的一口井,水好喝着呢,当时村里人都吃这口井里的水呢!

来到古井旁,陈老将军驻足良久,深情地说,这口井养育了多少人啊!停了停,老将军又说:“当时村里人喜欢到这口井边挑水用,部队来了以后,也到这儿来挑水,平时还可以,可到了1942年端午节后,由于大旱,井水就不够用的了。那时化名胡服的刘少奇同志就住在附近的院子里,他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山东指导工作,处理山东问题的。一天晚饭后,他借出来散步之际,找到了我和罗荣桓政委,对我们讲,这口井水是好喝,来这里挑水确实也比较近便。可事实上水是不够用的呀。你们说该怎么办才好?”

罗政委说:“大忙季节,因吃水问题给群众带来麻烦,是不应该的”。



“对！”刘少奇紧接着说道：“不能与民争水，要动员部队的指战员，及山东分局机关的同志，到村东面的沙河里挑水用，把井里的水让给老百姓吃。这样虽然远一点、累一点，但我们要克服！”

第二天部队的同志、机关的同志便主动到沙河里挑水用了。

谁知村干部知道这件事后，也动员群众到河里挑水吃，要把方便让给部队。部队的战士们便拦住他们，说服他们，叫他们到井边去挑。后来村里群众很受感动，便找西朱范村抗日小学的高敬斋校长写了个牌子，插在井边上。木牌上的“爱民井”3个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隔老远就能看到。

陈老将军自豪地说：“就这样，这口井又多了个爱民井的名字！”

爱民井，体现了刘少奇同志对群众的关心和体贴，也反映了战争年代军民一家的鱼水关系，至今还被传为佳话，还闪耀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芒。

陈老将军要离开西朱范村时，我又挤到车前，对银发飘飘的陈老将军说，围绕爱民井肯定还有很多故事吧。陈老将军笑了，“说句实话，西朱范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西朱范村的山水养育了我们，老百姓热心地帮助了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也忘不了啊。”

接着他又向在场的群众讲了爱民井的几件往事……

部队 1941 年刚来到西朱范一带时，由于从西边过来的人多（尤其是山西、河南、安徽、鲁南等地方的人），多数不会用井绳从井里往上面提水，他们大多数用井边的辘轳往上汲水。村里的老百姓使用麻或苘麻搓成的井绳拿给他们用，还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如何把系在井绳一头的水桶续到井里，如何在水面上把桶放倒灌满水，如何弯腰双手交替把水桶提上来。熟能生巧，后来战士们都能轻松地提水了。接着在师部警卫连的倡议下，战士们抽时间给村里的老人们送水，给部队的医院送水，给抗日小学送水……

最令人惊心的一次是在 1942 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刚刚下了一场雷阵雨，水沟里流水“哗哗”，蛙声此起彼伏。由于那口井在花园的院子里，而附近

又住着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八路军 115 师师部，所以这一带不仅有流动哨，古井周围还有固定的岗哨。为了辨识前来挑水的人是否是村里的群众，每班岗都配有村里的一名民兵。那场雨后，一个头戴斗篷的人挑着水桶急匆匆地往井边走来，斗篷前边拉得很低，遮住了整个脸。站岗的小战士有些疑惑，前来挑水的人一般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会热情地同战士们打招呼。小战士叫住了那个人，而同在岗位上的民兵也不认识那个人。小战士问他是哪里人？那个人说就是这个村里的，住在最后边。民兵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怎么不认识你？”那人又改口，说是村里抗日小学雇的炊事员。小战士说：“昨天我给抗日小学送水，怎么没见过你啊？”那人又说：“我可能不在学校里呗。”小战士又追了一句，“抗日小学有几个炊事员？”那人一时语塞，遂扔下水桶往东边的小河边跑去，刚要往河边的树林里钻，便被巡逻的战士们逮个正着。从那人身上翻出了一大包用纸包着的红矾，他是准备趁打水之际把红矾投到井里去的。经审问，那人是从沙河据点来的一名汉奸，受鬼子的指派，化装成挑水者前来投毒，以制造混乱，鬼子则企图趁机偷袭驻在村里的领导机关及八路军 115 师师部。

老将军最后笑着说，我们的战士和民兵的警惕性很高，所以敌人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所以“爱民井”的称呼才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而今，爱民井依然静静地坐落在路边的田地里，前来这个位于苏鲁两省三县交界处的村庄感受红色风情的游人，在爱民井旁徘徊，或沉思，或感叹，或拍照，或流连……

（作者单位：东海县南辰关工委）

责任编辑 邱仕明



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 工作组组长王新宇的跌宕人生

李鸿民



1954年，王新宇与幼子王红谊徐州留影

1952年，全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中共新海连市委组织调查组到云台区朝阳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查。本文的主人公王新宇任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工作组组长。工作组

成员有刘明宣、武心铎、张

传德、杨钦亭等。王新宇工作经验丰富，写作能力较强，在她的领导下，一篇名为《社越大优越性越大》的调查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选中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主席将篇名改为《大社的优越性》亲自为该文添加了按语。以此为起点，王新宇同志开启了新的政治生涯。

(一)

1918年2月19日，王新宇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前徐洞村。父亲曾在本村兴办义学，吸纳贫家子弟免费入学，后因带头抗捐而屡遭封建顽固势力加害。兄妹四人，受父亲思想影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新宇7岁入学，本名桂芬，15岁考入诸城省立第十三中学，同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平

男”，因长兄王拯民被捕、政治环境恶化和社会压力，被迫退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新宇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后与同学刘子平相识相爱，新婚不久，刘子平因组织武装抗日惨遭地方顽固派杀害。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王新宇擦干眼泪，毅然投身革命队伍。1938年10月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王新宇参加革命工作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她活动的地区，基本上在鲁中南一带。经历多个单位，担任过许多职务。但是，都与群众工作和妇女运动有关。

在战争年代，发动群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动员参军、支援前线、反封建斗争、土改、搞大生产运动，样样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自然也需要妇女的支持。所以，在战争年代领导妇女运动是一项既重要又艰巨的任务。

经历十多年的妇运工作锻炼，王新宇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尤其是妇女运动的经验，因而受到上级的重用和好评。

1947年，王新宇在临沭县委领导土改和支前工作中，以身作则、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荣立一等功。1948年7月，她担任了中共鲁中南六地委妇委会书记。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王新宇作为大会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盛会。

王新宇走过的革命历程，并非一帆风顺。

1940年，她因入党介绍人涉嫌“托派”而受到组织审查，被停止了组织关系，并由组织确定新的入党介绍人为她办理重新入党。其间，她坚持实事



求是,革命意志不动摇。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她还毅然将原具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名字“平男”改为“新宇”,以示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决裂和矢志为创造共产主义新世界奋斗终身的决心。后,直到1953年才由滨海地委组织部决定对王新宇的这一平反,并恢复了原来的党龄。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初叫增产节约运动,实际上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次整风运动。由于上面压指标、分任务、上纲上线,打击面不断扩大,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后来虽然做了一些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是还有“后遗症”,伤害了一些好人。

运动一开始,王新宇就受到了扩大化的冲击,被冠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抗运动”的罪名,开除党籍、刑事处分4个月缓期执行,降级从供给制小包干六等一级(相当于12级)降为24级,下放到当时还属山东省的新海连市政府做办事员。运动后期,虽然组织上对王新宇做了重新处理,撤销了刑事处分,改为留党察看半年,按行政18级待遇,但却附加一个条件,即必须与时任临沂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丈夫离婚,否则不予分配工作。当时的王新宇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可她面对婚姻肢解、骨肉分离的巨大压力,始终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忍痛在组织开具的“离婚公证书”上签了字,毅然选择了继续为党工作。

据当年新海连市委一位副书记回忆,在王新宇离开临沂之前,时任地委书记曾约她谈话,问她有什么意见,要不要申诉。王新宇干脆地回答:“没有,自己跌倒自己爬!”这位地委书记约她谈话的用意,我们不得而知,而王新宇的回答却是开门见山,斩钉截铁。

王新宇离开了这块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中走过的热土,来到了陌生的海边小城——新海连市。此后的岁月,笔者曾与她共事四年,她从未吐露过当时的心情。不过,毁家之痛、别子之念一定重重地刺痛着一位贤妻良母的心!因为毕竟她被迫离开时,几个孩子当时最大的只有6岁,最小的刚过1岁,他们正需要慈母的呵护啊!骨肉分离的悲痛滋味,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二)

王新宇来到新海连市,市里的领导和干部并没有冷落她、歧视她。他们尊重她、甚至同情她的处境。同时,她的才华,她的资历,她的奉献精神,也感

动了大家。

1952年,一个机会让王新宇峰回路转,迎来了人生命运的又一次改变。

当时,全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省要写几篇合作化的调查报告。江苏省选择了新海连市,市委组织调查组到云台区朝阳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查。调查组由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郑鹤牵头,调查组成员主要有:王新宇(时任中共新海连市委朝阳互助合作运动工作组组长)、刘明宣、武心铎、张传德、杨钦亭等。王新宇任调查组长,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工作经验丰富和写作能力较强,所以,这篇名为《社越大优越性越大》的调查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选中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该书撰写了长达2100字的序言和分篇按语,并将篇名改为《大社的优越性》。该文的按语中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的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

朝阳社的调查被中央选定后,王新宇也引起了徐州地委的重视。1953年7月23日,由中共云台区委作出决定,撤销对王新宇的处分。1954年4月2日,徐州地委、专署从东关两处偏僻的地方迁至青年路合署办公。合署后成立了生产办公室,统管农村工作,下设农林科、互助合作科和秘书科。王新宇被任命为秘书科科长,笔者是她领导下的秘书。后来,王新宇又兼任铜山大庙区委书记一年。

王新宇调来徐州时,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地委书记胡宏、副书记李忠、夏岩对其特别器重,有许多的工作压在她的肩上。给部队、机关、学校做农村形势报告的任务,基本上都落在王新宇身上。王新宇能写会讲,她的报告深受大家好评。最近,铜山一位老同志回忆当年听过王新宇报告后的感受说:“真是让大家目瞪口呆!”

那时,农村工作是重中之重,生产办公室(后改名互助合作部、生产合作部、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十分繁忙,起草报告、领导人讲话、上报下达的文件,基本都是王新宇亲自起草。作为秘书和科长的助手,笔者大多是为她提供素材,填补数字,名副其实地做她的助手。

尽管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加点,王新宇从来不



急不躁,态度和蔼,体贴同事,不摆架子,与同事们相处热情和谐。

1954年8月,王新宇把小儿子红谊从临沂接到身边抚养,她这才又有了一个简单的家。

王新宇爱好广泛,勤奋好学,工作之余,学诗词、练书法。1957年2月起,她报名参加了南京农学院函授部特训班学习,期满后又报名南京农学院农学系农业专业干部班,学制三年,毕业考试合格后,颁发毕业证书。

王新宇做出这一决定时,已届不惑之年,实在是人生又一挑战。有些人对她能否坚持到底完成学业,抱有怀疑的态度。

可是,王新宇坚持下来了。她的《心玉诗稿》收录的《学基础课》一诗这样写道:“三大敌人都不怕,如今岂惧数理化。革命干劲加钻研,天大困难也攻下。”不是豪言壮语,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她都在奋力拼搏。她的坚持和韧劲,令同窗好友刮目相看。

大学毕业归来,王新宇当之无愧地担起了徐州专署农林局局长、党组书记重任。1962年底,又调任专署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忘我工作,都是她的一贯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和审查,王新宇也不例外。选“九大”代表时,正值“革委会”掌权,而实际上“革委会”的大权掌握在军代表手里。在推选军队领导人为代表时,全场唯一没有举手同意的便是王新宇。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回答:“我不了解他。”这要冒多大的风险!每想起这件事,我们便会想起红军老大姐陈少敏,在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她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全国有个陈少敏,徐州有个王新宇。“巾帼不让须眉”,她真的说到做到了。

1978年4月,王新宇任徐州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顾问,兼任江苏省总工会徐州地区办事处主任、党组书记。其间,她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1983年3月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之后,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总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

王新宇离休时,离休证上写着行政14级,享受地市级待遇。对此,她生前曾对家人说过,这是组织对她的公正待遇,也是她跌倒后从零干出来的。

早在1965年担任计委副主任期间,王新宇就

发现身体不适,后查出胃癌,手术后一边疗养,一边工作,积劳成疾,胃常出血。后经多次检查,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直至1986年2月,经北京友谊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且已扩散,无法救治,不幸于2月13日辞世,享年68岁。骨灰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后,运回徐州,安葬在徐州凤凰山脚下的鲜花翠柏之中,后迁入徐州公墓。

(三)

王新宇离世后留下了一些诗稿遗墨,经子女蒐集成册,书名《心玉诗稿》。她的同乡同学、出生入死的战友,或为该书撰序,或题诗赠联,吐露心声,十分感人。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王照华同志撰写《缅怀战友王新宇》:

朝气蓬勃女青年,抗日救国鲁东南。
前方后方皆奋战,酸甜苦辣尽尝完。
天生一副硬骨头,顺逆环境亦坦然。
勤学苦练攻专业,农科战线一老干。

山东省文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王希坚同志《风入松》:

同乡同校更同庚,难忘旧时情。抗战相逢滨海地,群英会,高照明星。

胜利晨曦在望,何期恶梦台风。失家撤职下基层,江海独漂零。

不顾孤身沦逆境,迎考验,铁骨铮铮。挥泪遗诗捧读,如睹畴昔音容。

王新宇的入党介绍人李建修同志为王新宇写的对联:

诗情、心情、人情、史情,
词气、志气、勇气、正气。

《心玉诗稿》收入的王新宇旧作,多为修身、正己、励志、育人的内容,如她写给儿子红谊的一副对联: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已经做了领导干部的王红谊,将慈母的殷殷教诲视若珍璧,常悬之案头,激励自己。王新宇的书法颇见功力,她为子、侄、孙辈写了多幅条屏斗方,如“江山开眼界,风雪炼精神”“慎思敏行”“严己”等,如今都成了孩子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李鸿民,长期在徐州地委工作,曾任中共淮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兼秘书长,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徐州史志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汤若瑜——汤沟女性的骄傲

陈娟娟



汤若瑜 1984 年在“两灌”党史座谈会上发言

汤若瑜，女，1920 年 9 月 12 日出生于沭阳县汤沟乡大西庄一个地主家庭（现属灌南县汤沟镇周口村），共有兄妹三人。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汤沟街进步青年汤曙红在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汤若瑜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参加了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永生》《青年》等进步刊物。12 月底的一天，汤曙红在汤沟小学演讲，当讲到：“鬼子最近轰炸了苏北，他们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这些强盗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把同胞们都动员起来，不做亡国奴，坚决把鬼子赶出去！”汤若瑜这位 19 岁的富家小姐的心被点燃了，她激动地振臂高呼：“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接着她第一个在汤曙红《告同胞书》上签了名。每到逢集，汤若瑜就和读书会的男同志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呼唤民众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并相继编排了《放下你的鞭子》《血战

卢沟桥》《宛平战斗》《布袋队》等抗日剧目。主要是宣传我抗日将士英勇抗日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在日寇铁蹄下，中国苦难同胞遭受的苦难、耻辱，号召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团结抗日。在抗日话剧《古城的怒吼》里，汤若瑜饰演了一个老太婆，其侄女明霞饰演了一个小姑娘。此剧的演出轰动了汤沟、李恒、汤涧，可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你这个死丫头，一个没过门的姑娘让人喊妈妈，成什么体统，也不怕丢人。”父亲汤运池更是气的连连跺脚，“这！这！这成什么世道哟！”可是，汤若瑜却不管这些，照样带着小侄女汤明霞参加抗日活动，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动员小伙子们参加抗日自卫队，老人参加农救会，妇女参加妇救会，小孩参加儿童团。汤曙红非常高兴地说：“小姑，你可真是好样的，为汤沟妇女做出了好样子！”在读书会的努力下，1938 年春，汤沟成立了“汤沟乡民众抗日自卫队”，共有 2000 多人，汤曙红被推举为大队长。在汤若瑜的艰苦努力下，汤沟的姑娘们也纷纷走出家门，投身抗日的洪流。

1939 年 2 月，中共苏皖特委决定成立中共海属工作委员会，派中共邳睢铜工委组织部长余耀海、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一连指导员孙朝旭到东（海）灌（云）沭（阳）地区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在工委书记余耀海的亲自介绍下，汤若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东灌沭地区恢复共产党组织后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之一。

是年 4 月 10 日，在汤沟民众抗日自卫队的基础上，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在汤沟镇西北的小陈庄（现属灌南县汤沟镇周口村 3 组）成立，汤若瑜担任了三团文工队分队长，为了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汤若瑜首先抛弃了妈妈强行给她包在脚上的裹脚布，顾不上封建世俗观念的约束，没



白天、没黑夜地奔忙着。队员许永进的母亲不让女儿参加宣传队,说那是丢人现眼、伤风败俗,汤若瑜三番五次跑去做工作,并以自己的富家小姐身份成功说服了许永进的母亲,让其女儿参加抗日宣传。面对汤若瑜的抗日活动,汤家近房头的汤沟乡乡长汤宝光(由于他心眼多,当地人都称他“汤大猴子”)坐不住了,他指着汤若瑜的背影骂道:“现在的砖头瓦片成了精,十几、二十几的姑娘在外面乱七八糟。”把汤若瑜比作“夜狐”,说什么“夜狐白日走,女权昌自由”。对这些冷嘲热讽,汤若瑜理都不理,专门穿着灰布军装在汤沟街走来走去,以吸引女同胞的注视,唤起她们的觉悟。汤大猴找到若瑜的父亲问道:“这丫头你还管不管了,穿的衣服男不男女不女,一天到晚疯疯癫癫。”汤若瑜的父亲没法,只好把女儿关进汤大猴的汤圩老巢,派人看守。一天傍晚,汤若瑜以小姐的身份说服看管她的佣人赵妈,又以两块银元买通了院外站岗的乡丁,小鸟脱笼似地飞回了三团部队。

1939年7月17日,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王绪五所部小队队长周法乾杀害,制造了震惊江苏大地的“汤沟惨案”,三团忍痛西撤,汤若瑜奉命留在家乡坚持斗争。1940年6月,年仅20岁的汤若瑜担任了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兼民运委员。夏末,国民党灌云县政府向全县发行县内货币——灌云流通券,时为灌五区区委书记的汤若瑜亲自带领区小队上街宣传,号召人民群众抵制使用流通券,要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团结抗日。因而深受国民党灌云县党部的痛恨,发誓要除掉汤若瑜。可是,汤若瑜从容镇定,毫无惧色。1940年8月,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汤沟的汤圩成立,汤若瑜被任命为县长孙笃生的秘书,专门负责联系群众工作,而党内则为中共灌云县委副书记。在这期间,汤若瑜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便于接近民众的优势,广泛接近群众,发动群众,配合县委书记吴书,倾其全力整顿组织,发展抗日武装,相继开办了三期党员培训班,学习党的“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研究分析主力三团西撤后的地方形势,并在上马台、薛荡一带成立了“抗日兄弟团”。在政府工作中,汤若瑜跟随孙笃生县长到处奔忙,先后建立了灌一区、灌三区、灌四区、灌五区、灌六区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三、四区都成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区中队,使得灌云的抗日斗争形势大大好转。

1942年2月,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汤若瑜被组织派到中共华中局第三期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即担任了中共淮海区第一中心县委(辖灌云、沭阳两县)组织部部长。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汤若瑜和自己的老领导——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原副团长、后淮海区党委军事部长、第一中心县委书记张克辛相恋。1943年,这对革命的伴侣在抗日的烽火中喜结连理,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她们共生有3男5女8个孩子。1944年秋,汤若瑜担任淮海区第一中心县委书记,并参加了淮海地委的整风运动,任整风队组长,在这期间,她的长女出世了,汤若瑜既要忙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又要照顾孩子,忙的不可开交。可是凭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汤若瑜在秘书、组长、妻子、母亲之中行走自若,妥善处理,深受淮海地委领导的赏识,称她为“能干的女干部”!

1945年5月24日,淮海区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沭阳召开,区、县524位妇女代表欢聚一堂,成立了淮海地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汤若瑜被选为会长。是年6月,汤若瑜在淮海地委妇委会工作,并担任妇委会主任,7月,汤若瑜与吕继英等9人被淮海妇联与盐阜妇联共同推选为苏北妇联筹委会委员,汤若瑜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46年1月,淮海地委改为华中第六地委,汤若瑜被选为妇联总会会长。1947年,汤若瑜调任苏北第六专署医院教导处副主任。是年11月至1949年4月,汤若瑜一直担任苏皖第六行政区妇女联合会会长。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汤若瑜还兼任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北第六地方筹委会书记。之后,她和丈夫张克辛一直在部队工作,1958年,转业后相继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机关工委书记、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012年9月11日,汤若瑜这位东灌沭地区抗日传奇式的女干部在她92岁之年与世长辞。时至今日,在灌云、灌南、沭阳、东海的老干部中,提起汤若瑜,人们还是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

(作者单位:灌南县汤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鲜为人知的

音乐大师谢绍曾

张学贤



谢绍曾 88 岁获金钟奖照片

(一)

清末民初，古海州逐步形成“殷、葛、沈、杨、谢”五大家族。谢家代表人物叫谢希愚，祖居海州城里，有房屋百余间、农田八百顷，还经营一家“丰宜”商号，生意兴隆，日进斗金。谢家虽排在五大家族之尾，但其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仅次于沈家，与杨家不相上下。

谢希愚先后娶方氏和姚氏为妻，共生育七子二女。由于大儿子痴呆不能生育，四儿子家人丁兴旺，生有二子二女，经谢希愚同意，决定把四房长子谢绍曾过继给大房，从此，谢绍曾成为谢家的长房长孙。

家父十几岁就在谢家打工，由于生性机灵、忠厚老实，很受老财主谢希愚的赏识，常年留在身边，所以对谢家的事特别是谢绍曾的童年生活有较多的了解。

据家父介绍，谢绍曾童年生活并不顺当，由于贪玩、逃学、撒谎，经常遭受祖父的训斥和惩罚，有时让他饿着肚子去读书。家父看在眼里很不忍心，就和厨师商量，偷偷拿上两个馒头或包子、还有酱菜、咸鸭蛋，塞到谢绍曾的书包里，耐心规劝他，好好读书，不要让老祖父失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谢绍曾逐渐懂事，改掉了不良习惯，发愤读书，求学上进，从此祖父把他当成掌上明珠，请最好的老师授课，选择最好的学校供他读书。谢绍曾在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由于军阀混战，暂时回到家乡东海师范高师部学习。此时的谢绍曾，已显示出艺术天赋，精于美术、音乐，喜爱多种乐器，是海州城里第一个购买学习小提琴的中学生。

据有关史料介绍，1930年夏，时年16岁的谢绍曾高师毕业后，先考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先生学习油画，后来决定放弃美术专业，又考取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修音乐。日本占领时期，谢绍曾离开上海，1938年在徐悲鸿先生主持的桂林美术学院音乐科任教。1941年至1946年间，曾兼任重庆歌剧学校、北碚师范和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在重庆复校）三校教师，1944年晋升教授。1946年随学校回到上海，兼任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解放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兼教



务长,上海市高等教学人员评委委员,中国音协上海分会理事。

(二)

日本占领海州后,谢家开始败落,谢希愚老人也于1940年在灌云病逝,享年75岁。不久,家父应谢大奶之邀,把家从海州关庙巷搬到中大街谢家大院,帮助谢家料理门户,一直到1951年之后才离开谢家大院。

谢绍曾去上海读书、工作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回过故乡,所以家父对其一直挂念在心,经常给我讲述谢绍曾幼年的故事,特别是当我贪玩、学习不专心时,他就用谢绍曾改过自新、读书上进,成为大学教授的故事,激励我好好读书,所以在少年时代,我就特别崇拜谢绍曾,盼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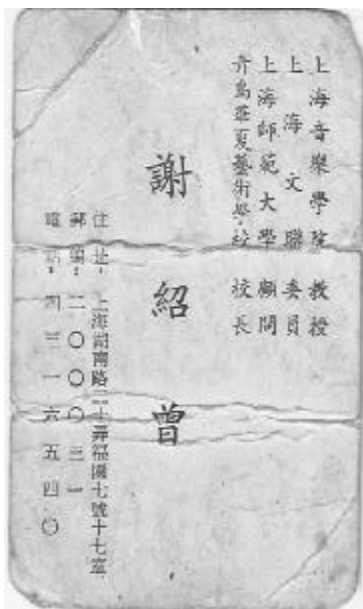
1948年11月6日海州解放,1949年春我考取海师高师部,由于党的关心培养,加上自身的努力,成为学生会骨干,1950年夏代表母校出席临沂地区学联筹委会(当时港城隶属山东),并被推选出席上海华东学联代表。谢大奶听到这个消息后眉笑眼开,当时请一位教师用毛笔写了一封家书,并附上两件上好衣料,托我去上海开会时务期送交多年未见的儿子。后来由于会期改变,未能成行,我和谢家空喜一回。

1951年2月,我海师毕业后留校工作,1956年1月由海师调到市委宣传部,家也随着搬到新浦,由于工作繁忙,对谢家的事逐渐淡忘。1994年,是海师建校80周年,为了做好校庆的准备工作,海师宋健民校长聘请我和朱林森等七位老校友为筹委会顾问,先后多次到海师讨论筹备事宜。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黄永言老师(曾任海师教务主任、市民盟副主任、海州区副区长,也是谢家近亲)告诉我,他接受宋校长的委托,专程去上海邀请谢绍曾老人回母校参加80周年校庆。开始,谢老以教务繁忙、年事已高(80岁),不便远行谢绝,经再三动员,才答应下来,条件是开完会即返回,不给学校增加麻烦。同时又告诉我,谢老记忆力很好,打听许多亲朋好友,还提到在谢家打工多年的张炳义老人是否健在。黄老师告诉他,张老不仅健在,而且儿孙满堂,

儿子担任市委统战部部长,是我们民主党派的好朋友。他听说以后非常兴奋,表示回海州之后一定要看望张老。

当年海师80周年校庆,家中除了我还有3人接到邀请,家父张炳义曾于1932-1937年在海州师范校长室当工友;老伴马淑芬1952年7月毕业于海州师范速师部;大儿子张年庚1982年毕业于海州师范干部班。当我把谢绍曾将要来连云港参加校庆一事告诉家父时,已是94岁高龄的老父亲喜的合不拢嘴,每天掰着手指计算日期。校庆那天早上,我们提前半小时赶到会场,不一会儿,谢绍曾等嘉宾陆续进入会场,在前排落坐。在黄永言老师介绍之后,我们终于见面了,只见谢老一把抱住老父亲,连声问安,不停地感谢当年家父对他的关爱之情。而后对我说:“你老父亲贫寒出身,心地善良,能活到今天,并培养出有出息的子孙,这是好人有好报。”为了便于联系,谢老又从身上掏出两张名片,一张塞给家父,一张送给我,一再叮咛,有机会去上海,一定要到他家作客。第二年,黄永言老师去上海办事,顺道看望了谢老,谢老又特地叫家人到商店买了一支上等人参,托黄老师转送给家父。当时,我们准备买只老母鸡和这支人参煨汤给老父亲补补身子,老人不同意,一直把这支参放在卧室窗台上,说看到人参就等于看到谢绍曾。

2002年3月28日,家父无疾而终,享年102岁。在去世前几天,告诉我内衣里还装着谢老赠送的名片,待我从老人的口袋里取出时,发现名片已揉得变黄,中间还有两条裂纹。从人只看不吃,到名片揣在身上长达九年之久,让我看到家父和谢老这对忘年之交感情有



家父生前保存的泛黄的谢绍曾名片



多深啊!

(三)

海师 80 周年校庆时,我有幸和谢绍曾老人见过一面,由于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交谈,所以对谢老的生平业绩还是知之甚少。直到 20 年后,也就是 2014 年 11 月 22 日,终于在《苍梧晚报》教育专版上看到了有关缅怀谢绍曾老人的文章。排在上首的是张素云撰写的《百年师专走出的音乐大师谢绍曾》,下面是师专严淡如老师撰写的《追寻大师的足迹》,版面中间还附有中国金钟奖资料的新闻链接。看到这个专版,我如获至宝,反复细读,让我对谢绍曾老人在声乐教坛上的光辉业绩有了较多的了解。

严淡如老师是在谢绍曾教授百年华诞临近的日子去上海寻访的,有幸会见了听力有严重障碍、已是 95 岁高龄的谢老夫人胡靖舫教授,并在一位阿姨充当翻译的帮助下,和胡教授作了简短的交谈,并察看了谢老当年的卧室,翻看了谢老留下的照片,在缅怀文章中有两段细致感人的描述:

说到谢老百年华诞纪念的事,老人一如谢老抱着淡泊名利的态度。她告诉我,去年以来就有不少弟子来探望提出要求,但她同从美国回来省亲的女儿商量了,就像谢老在世一贯坚持的那样,不想再惊动大家了。弟子们的盛情也一一谢绝了。

环顾四周,只觉满屋都是书香。房间朴实无华。墙上挂满了家人和弟子的照片。谢老收集的书籍、音响设备、唱片和磁带如同积木似的层层叠叠,无以复加。

书房窗户旁有一块纪念和缅怀谢老的铜牌。我走近前去,默读着铜牌上的文字,是 35 位年轻一代的歌唱家和声乐教师的姓名。我是声乐圈外人,并不都熟悉。但读过谢老的纪念文集,有几位谢门弟子印象特别深。陈小群,她是谢老的骄傲,多次在国际声乐比赛获奖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1980 年在巴西黑约热内卢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得“最美嗓音奖”。另一位在国际声乐比赛中多次获奖者是葛毅。现在他(她)们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谢老有突出成就的弟子远不止这 35 位,我们知道的还有更早一些的,如曾在中央乐团任副团长的谢明、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叶素、内蒙古师大音乐学院院

长肖黎声,曾在莫斯科成功主演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歌唱家郑兴丽,都是谢门桃李中的出类拔萃者。“声乐教坛上,谢门弟子多,桃李满天下,代代耀星光”,这样的赞语并没有太多的夸张。

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师专校友张素云同志在缅怀文章中,除了赞颂谢老在声乐教育上成就卓著,被誉为“声乐泰斗”“一代宗师”,并于 2002 年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和终生荣誉勋章,还表达了一种内疚之情。她说,对谢老来说,我们港城的知音还是太少了,就是声乐爱好者也还没有一个能师从谢老门下。据了解,当年王宏伟、杨阳等许多声乐艺术家从全国各地慕名前往上海求教于谢老,山东、新疆、香港等地还专门办班,请谢老讲学授艺,可惜我们都错过了“近水楼台”的机会,现在再想“得月”,只能悔之晚矣!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缅怀他、宣传他、学习他,让全市人民都知道谢绍曾是百年师专走出的音乐大师!

读了上述两篇缅怀文章,让我不得不深思一个问题,我们故乡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为什么对这样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知之甚少,甚至发出“近水楼台未得月”的叹息?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谢老早在 1930 年就去上海读书、工作,离开故乡的时间太早;二是谢老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即使 1994 年回母校参加 80 周年校庆,也是来去匆匆,没有搞什么“衣锦还乡”;三是谢老终身从事声乐教学和校务管理,专心致志为国家培养人才,无暇参加社会活动,可能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知名度。

据了解,谢老与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同窗、共事数十载,先后都获得金钟奖和终身荣誉勋章的殊荣,但在港城,几乎“无人不知”周晓燕,谢老却成为“默默无闻”的音乐大师。由此看来,为谢老树碑立传,让其金钟长润,不仅是人心所向,也是我们港城人应有的担当!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责任编辑 于冰清



信史良志 功莫大焉

——《灌南县志(1984~2005)》读后

朱月潭

2015年7月,我应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邀请,赴连云港为苏北片修志骨干培训班作题为“主编的多维视角与志书质量”的专题报告。会后,我又应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邀请,有幸担任《灌南县志(1984~2005)》终审会的主审。2016年9月底,当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韩翠林主任、杨培军副主任将正式出版的县志送给我时,我们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握手、拍打手臂与肩膀……《灌南县志》与《亭湖区志》的编纂一样,自始至终均逾10年,其艰难之滋味、遂愿之欣慰,绝非亲历者所能体察与体悟。如今捧读全书,激动之余静思之,我感佩于《灌南县志》编修者的品格与《灌南县志》外部的、本质的模样。

一、修改不遗余力,超越自身

《灌南县志(1984~2005)》的面世,距其终审会结束已是一年。经验与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不错的志书,一部信史,因为一年前连云港市地方志办与灌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灌南县志(1984~2005)》终审会是那么的专业而扎实。评审人员高度负责、敬业奉献,修改意见数百上千,以至于把《灌南县志》的编纂人员打趴下来三天。但他们没有被问题所吓到,没有因批评而伤自尊,没有因“挑刺”而失去“志”在必得的信心与决心。他们仅用三天的时间平复受伤的心,迅速冷静下来,分类梳理修改意见,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厘清史实,修正讹误,打磨文字,精炼叙述,参照比较,规范体例。一年时间,足以消解终审稿中存在的问题,我想也就

守住了修志的底线——信史。

二、纂辑基础扎实,信史有源

志书的第一生命在于真实,而真实源于第一手资料。《灌南县志》的编纂,其专门的资料征集自2006年起历时五年多。相对即时的资料征集,保证了原始资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相对长时的资料征集,保证了搜集资料的广泛性与全面性;专门机关的资料征集,保证了资料采集的专业性与针对性。整部志书,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一方全景展示,一事发展贯穿,资料详实充分。事物的起始、变化,以史料铺陈,叙而有据,大量的事物以数据反映年度发展的变化,走势清晰。在原始资料征集的基础上,经过分纂、总纂的充实、完善,至终审稿时已是近300万言,资料纂辑甚至已达繁复的地步,如“灌南县人民代表大会”编的字数达到6万余字。但这种繁复是纂辑志书所必须的。一部精品良志,必然有一个由冗长的“巨制”到精炼的良志的过程。这种繁复,反映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的本质,反映的是志书作为资料纂辑的重要特征;这种繁复,让信史有源,为精品良志奠定扎实根基,亦“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灌南县人民代表大会”编,没有终审稿中的6万余字,就不可能有成书后的近3万字。

三、跟踪发展前沿,勉力创新

存史修志,在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志书发展到今天,形成一定的定例、范式。但志书的发展、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止。自首轮修志以来,新志书较



之旧志书已经发生极大的改变。篇目设置,横排门类更为精细,纵述历史更为仔细。《灌南县志》大量列表,为抽象的文字叙述赋予精准的数据支撑。《灌南县志》在把握地方特色主题的同时,着力反映时代特征。志首图照近 150 帧,内容丰富,全景展示。图照选取,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灌南致力实现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本质取向。图照选取,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坚持以民为本,突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创造与广泛参与,体现灌南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灌南县志》在常规的“编”志之外,另辟“专记”“附录”,有效拓展志书的纂述内容。特别是,“专记”内容的精心选取,极大提升了县志的品位。“江苏灌南刘氏墓志与吴承恩的祖居地”“汤沟美酒万里香”“灌河开发的战略构想”,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个维度织就灌南的知名,从人文历史、社会生活、自然禀赋三个维度推送灌南的美誉。

四、编纂注重实效,便于运用

志书的价值,不在将一堆资料“打包”捆扎、束之高阁,而在将海量的历史信息条理化、精要化,从而便于社会大众检索、披览历史真相,回望所走过的路,砥砺前行。《灌南县志(1984~2005)》,在将 21 年的史料“压缩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使用需求。首先,“大事记”完整勾勒 30 年。本着远粗近细、详今略古的原则,将自 1984 年起的 1980 年代,每年都提炼出 20 件左右的大事以记之,时间、事项、影响较为齐全。下限延至 2014 年,增强志书的可读性,满足读者现实感诉求。2010 年代的大事,年均达到 50 余件。浏览了 46 页 800 余件大事,就能对 1984~2014 年 30 年灌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其次,附录的内容具有高度的实用性。“文件辑存”所辑 9 份文件,交代灌南县的前世今生以及灌南县农村土地承包、外商投资经营、建立新农合制度、加快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战略决策。“诗文撷萃”所辑 13 篇诗文,代表明清以来灌南籍人士的最高诗文水平,反映灌南文人的宽广视野与博大情怀。“特产选介”介绍灌南 30 余种农副土特及工业产品,代表农副业的发展状况与

工业发展特色。“前志勘误”体现《灌南县志(1984~2005)》的续志特点,匡正前志 64 处 59 条讹误,还历史本来面貌,以正视听。

当然,志书编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灌南县志(1984~2005)》同样如此。这不仅源于文字作品标准的相对性,源于编修者、阅读者个人偏好的差异性,而且受制于时间有限、编修者能力有限的刚性约束。《灌南县志》的美中不足,表现在“撰著”欠缺。虽然材料搜集充足,但在材料的摄取、事物发展断面的截取等纂辑上存在上升空间。特别是,在由历史材料到历史智慧的升华上较为缺失。虽然,地方志的主体是叙述,但并不排斥归纳、提炼、理据充分基础上演绎与理性思辨的画龙点睛的“论说”,同样需要拨开历史迷雾的“灼见”、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知”、昭示县域发展过程的特点。这些,最需要出现在“编”“章”之下无题序之中,均需要编修者的撰著——不是对历史材料进行简单的增删编排所能完成;《灌南县志》的美中不足,还表现在个别事物的归类有失精当。譬如,将“环境保护”置于“自然环境”编。环境保护,是一种“管理”,不应归入自然部类,明显应归入经济部类(综合经济管理的一部分)或社会部类(环境保护,致力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且,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应当居于“编”的位置。《灌南县志》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志书是无可挑剔与无可指摘的。

(作者朱月潭,中国译协会会员,盐城工学院、中共盐城市委党校兼职教授,《盐城市亭湖区志(1983~2009)》主编,曾任中共盐城市亭湖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史办主任)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一部继承与创新的上乘之作

——读《灌南县志(1984-2005)》有感

姜龙才

《灌南县志(1984-2005)》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继首轮编修的《灌南县志》的续志,也是灌南建县以来的第二部志书。这部《灌南县志(1984-2005)》既继承了首轮编修的《灌南县志》的优长,又结合变化了的地情,积极探索,摒弃其弊端,走出了一条融继承与创新于一体的新路。

一、依时因事设置篇目

二轮修志多为续修,其断限范围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记述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经济结构由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向多元化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民营经济发展、旅游业等新兴三产的大量涌现,这些都是首轮志书未能涉及的方面。如果我们仍照搬照抄首轮志书的篇目,对发生了巨变的地情熟视无睹,续修志书必然走入教条主义的“死胡同”。反之,完全抛开首轮志书这一基础,搞所谓的“全面创新”,必将割裂时空、割裂历史,使二轮志书陷入“无本之木”的尴尬处境。《灌南县志(1984-2005)》正确处理了这一对矛盾,在首轮志书篇目基础上设计了续志篇目。

首轮县志篇目: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林牧副渔业、水利、工业、交通运输、邮电、财政·税务·审计、金融、商业、粮油经营、工商行政管理、经济综合管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党派社团、政权政协、治安司法、劳动人事、民政、军事、

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医药卫生、社会方言、人物、附录。

第二轮县志篇目:总述、大事记、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水利、城乡建设与管理、交通、通信、开放型经济、园区建设与灌河半岛开发、工业、农业、商贸服务业、金融业、财政税务、经济综合管理、中共灌南委员会、灌南县人民代表大会、灌南县人民政府、政协灌南委员会、群众团体、政法、军事、民政、劳保人事、科学技术、教育、文体体育、卫生、传媒史志档案、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生活、乡镇、人物、专记、附录、索引。

对比以上两个篇目可知,第二轮县志篇目中有22编沿用首轮县志,15编或分或合,6编新设。二轮县志篇目较之首轮县志更加科学合理,特色明显,归属得当,层次清晰,符合断限内灌南县情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续志要更准确、合理记述发展变化了的地情,不能简单照搬前志篇目,必须依时因事据实调整不适用部分,保留前志适用部分,增设新的部分。换言之,志书篇目设计是编纂者对记述主体总体认知水平的体现,只要有利于统筹安排所记述的内容、彰显时代特色和本地特色,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

二、内容记述务实且有新意

志书编纂讲求的是“述而不论”,要求在“平实”中见功夫。具体表现就是用资料说话,用丰富翔实的资料保存历史,通过精心筛选的资料揭示事物发



展变化规律,展现时代风貌。《灌南县志(1984—2005)》的资料不少是经过精心剪裁,选取具有显著“存史、资政、育人”价值的地情内容。其资料裁剪的手法可归纳为常规内容记述坚持详主略次,特色内容记述注重深度挖掘。如在人口编中,以花名册形式,设姓名、性别、生卒年份、年龄、登记年份、所在镇(乡)村等栏目,收录了62位1999—2005年全县百岁老人名录,通过这一特殊群体记述,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分享了社会发展红利,不但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增进了健康福利,人口期望寿命在不断延长。再如对乡镇的记述。首轮县志记述乡镇概况时重在记述乡镇的历史沿革,二轮县志则重在记述其地理位置;首轮志记乡镇重经济发展轻社会事业,二轮县志坚持二者并重。这种务实而有效的记述方法,既避免与首轮志简单重复,又弥补首轮志记述之不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回归本源彰显特色

特色是志书的生命,一部志书如果囿于所谓的“正统”而懒于革新除旧,只能是一部抱残守缺的泛泛之作,难以成为精品良志。《灌南县志(1984—2005)》最大的一个亮点是社会生活编中有关姓氏宗族的记述,文字很少,仅有2000余字,设有姓氏和宗族两节。姓氏记有363个单姓、5个复姓;宗族记有十几个家谱(宗谱、谱牒)以及续修、重修、新修等内容。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三项基本功能,前两项功能在志书中均能直接落到实处,而第三项功能较多地则是隐含要字里行间,是“隐性”的。实际上,志书完全可以通过记述宗谱这方面内容将“教化”功能光明正大地显现出来。自古以来,华夏子孙以姓氏为家族延续的标志,每一种姓都包含其独特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以至于宗谱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三大支柱之一。南宋文天祥在题会昌《赖氏族谱》指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以记事实,犹谱以序昭穆。”宗谱里记录有丰富家风、家规、家训等内容,家风展示了社会传统美德,

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源泉,是民风社风的根基,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综观首轮志书,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甚少甚至没有宗谱方面的记述。在已出版的二轮志书中,基本仍沿袭这一做法。然而可惜的是,志界对这一内容集体性选择忽视。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与宗谱在中华文明传承中所处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背向而行。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未能记录集中展示社会正能量的内容,大大弱化了志书“育人”功能,实在是令人费解。可喜的是,《灌南县志(1984—2005)》打破常规,在记录宗谱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回归了志书要记述的本源,这种立于正道,追求完美的精神可敬可贺!

四、运用“专记”弥补面上记述之不足

首轮志书总结得出的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志书体裁,除志体外,在二轮修志中其他诸体并未得到充分运用,这在《灌南县志(1984—2005)》中同样得到了验证。如正文中没有插图,这是一个遗憾。但《灌南县志(1984—2005)》也有所突破,专门设立了“专记”一篇,收录“汤沟美酒万里香”“灌河开发的战略构想”“江苏灌南刘氏墓志与吴承恩的祖居地”三篇文章。汤沟酒是江苏白酒产业代表“三沟一河”(双沟、汤沟、高沟、洋河)之一,也是地方经济支柱产业。这是从一个有代表性的支柱产业角度记述灌南产业经济发展历程。灌河开发是策应全国十大海港——连云港港“一体两翼”组合大港开发的战略性举措,虽然距记述下限仅有一年时间,但其对灌南县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将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记述现今战略规划对未来发展影响,记述的是一种发展趋势。而“刘氏墓志”内容是用历史考证的手法阐述“吴承恩的祖居地”与灌南的关系。编纂者精心选取这三篇文章,将其归集一处设为“专记”,是别具匠心的,弥补了志书在面上“求全”而导致点上記述不足之憾,与前文互有呼应,增强了志书的资料性、可读性。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精品良志磨砺出

——《灌南县志(1984~2005)》编修纪略

韩翠林

第一部《灌南县志》于1995年6月出版,断限于1984年。续修《灌南县志(1984~2005)》工作从2006年2月启动,到2016年4月完稿,前后历时10年,经过县地方志办和各承编单位上百名编写人员的倾情付出和精心编纂,现已出版面世。这既是灌南地方志事业发展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全县公共文化领域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作为亲历者,我们能为这部鸿篇巨制画上圆满的句号,感到非常的欣慰和无比的自豪,同时也对一直以来各方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致以诚挚的谢忱!

新志著成 汇聚了各方智慧

《灌南县志》今日能成正果,实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回观志之精要,鲜明的特点让我们铭记于心:横陈百科。全志涵盖百业,体量庞大、门类齐全,除图照及总述、大事记、附录外,共设34编约220万字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记述,大到支柱产业的宏观纵述,小到餐饮服务的微观记载,境内所有业态均有涉及,内容极为丰富。纵述始末。主体记述上到1984年,部分编章稍有前移,下限止于2005年,人物、大事记及部分彩色图片延伸至2014年底,完美呈现了灌南不同时期的历史变革、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回眸行之历程,曾经的拥有让我们感奋不已:参与人员众多,全县上百个单位超百名人员参与编写,且大家一丝不苟、联袂打造,体现了“众手成志”之果。编纂周期较长,从启动、篇目拟定、资料搜集、撰写初稿、分纂、总纂、审校到最

后付梓印刷、出版发行,历经十载春秋、3000多个日日夜夜……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得益于各单位、各乡镇的全力配合,得益于专家学者、修志同仁的倾力协助,得益于所有参与者、编纂者的聚力作为,汇聚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和智慧。

2006年2月,按照省市统一部署,续修《灌南县志》工作正式启动。2006年7月,县政府成立《灌南县志》编纂委员会。2007年1月,县政府召开《灌南县志》编纂工作动员会。从此,各单位、各乡镇主动跟进,全县上下形成“一盘棋”格局,县志编纂工作开始迈上新征程。

在编纂过程中,编委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灌南县志》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框架结构和编写体例、编纂进度和质量标准等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并及时讨论敲定并不断加强指导,多次召开编纂工作协调推进会,要求各承编单位把县志编纂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志稿撰写工作优质高效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紧扣机构组建、资料征集、初稿分纂、纲目验收、志稿续修、完成总纂、评审验收、修改完善等环节的工作流程,集智集力、集思广益,努力消除“硬伤”、尽量减少“遗憾”,并分别于2013年12月、2015年9月、2016年1月通过市地方志办初审、复审和终审,2016年3月通过市地方志办审查验收。每一个环节后,我们按照市地方志办领导和专家及出版社的意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各项图书编校规范进行不间断



地审查校核,直至定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充满文字张力和文化底蕴的地方志书。

编纂过程 凝结了众人汗水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灌南县志》成书的背后是上百名编写者和编辑人员长年累月的含辛茹苦、殚精竭虑,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其中的艰苦、辛苦、清苦,非亲历者难以知晓。清代方志学大家章学诚认为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对此,我们深谙其中“发动落实难、资料完备难、重复避免难、数据准确难、书写规范难、队伍稳定难和工作推进难”的境遇和苦衷,坚持不忘初心、勤耕不辍,与时俱进、砥砺前行,使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逐一加以克服和解决。

在《灌南县志》的编纂历程中,先后有陈书军、阮冰、左军、李振峰4位县长担任编委会主任。任期内,他们亲自过问编纂工作,并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2014年3月,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对全省25家修志工作滞后的县区进行通报,灌南位列其中。时任县委书记阮冰、县长李振峰在百忙之中作出批示,要求成立专门班子,确保2016年底前完成县志编修任务。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更是动力,既是鼓舞更是信任。之后,我们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其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编审流程,在翻阅大量档案、爬梳众多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有关专家学者和县四套班子领导及广大老干部、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做好编目结构调整、交叉重复处理、缺漏内容弥补等工作,并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数字关、保密关和印刷质量关。为把《灌南县志》编纂成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地情信史,我们围绕志书观点是否把握正确、记述内容是否全面系统、史实数据是否准确无误、材料选择是否反映特质、文字表述是否简洁精炼、图表设计是否新颖美观等,所有编纂人员和衷共济、精准发力;老同志皓首穷经、孜孜以求,中年同志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年轻同志虚心学习、勇挑重担,大家凭着对文明传承的执著追求,凭着对地方志事业的深厚感情,始终无怨无悔、不计名利地奉献着。可以说《灌南县志》的每一个文字、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标点都凝结了编纂人员的深情、艰辛和汗水。

志书品质 融合了诸多要素

修志千古事,质量是生命。在《灌南县志》编纂的每一道步骤上、每一个环节中,我们都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围绕打造精品良志,我们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做到不唯书、不唯人、不唯上,对资料进行广征博采、悉心考究,去伪存真、用心取舍,仔细推敲、精心打磨,使诸多有价值资料在志书中得到了确当运用,突出了时代特征、志书特点和地方特色:在篇目设置上,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灌南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历史进程和重大成就,设34编183章724节,采用大编结构和条目结合体,并以时有序、直述其事,使全志的框架和内容有条不紊、清楚明朗;在体裁应用上,借助年鉴的编纂体例,融合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多方法,既注重总述、编章节无题序的撰写,提升志书的概括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又通过“大事记”的提炼表述,来突出某项事情的重要性、突出性和感官性,使全志纲举目张、纲目相济、相得益彰;在记述内容上,突出经济部类和人文部类的记述,且内容的比例安排错落有致、相对合理,使志书能够见物观人;在记述方法上,采用集散结合、详略互见、各有侧重等方法,做到详当今略古远、详独特略共有、详典型略一般、详关键略平常,使入志的资料更加符合客观事物的情理、更加符合历史进步的规律、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实情。众手成青史,妙笔著铁志。《灌南县志》是近年来灌南县最为浩大的图书编纂工程。作为“地方之全史”,集百业于一炉、会万言于一帙,系统记录了1984~2005年间灌南的发展历程和沧桑巨变,县情民风和文化传承,历史风韵和崭新成就,既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地情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宣传和研究灌南的重要文献资料,更是一部开展爱党、爱国、爱家乡教育的极好乡土教材。它的出版发行,将发挥地方志“记载历史、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当代”的功能,为实现“全面脱贫奔小康”宏伟目标,加快推进“强富美高”新灌南建设起到积极的文化引领作用。

(作者系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于冰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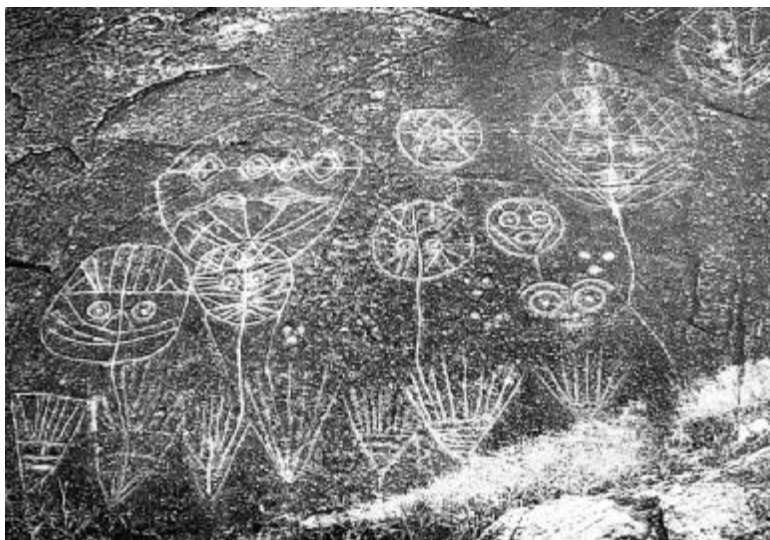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史上的精彩一页

——古海州的写抄、刻印和出版

李洪甫

书的早期形态,是以写刻、誊抄的物质形态保留、传播、交流的。据我国古代的文献记录以及出版史学界的研究,在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时期,结绳、堆石、刻画、悬挂饰物等是主要的表达手段。原始文字和符号初萌后,契刻是原始社会中晚期最主要的记事和交流方式。即便到 3000 年前的商代,我国最早成熟的文字“三千甲骨文”面世,契刻依然是主要的书写方式,甚而沿用至今。与上述形式始终伴存的,还有一种用各类颜料在石、木、竹、皮革、布帛上书写绘制图形文字用以交流、展示、传播,在笔墨问世之后、纸张发明之前,独占鳌头。

连云港保存有 5000 多年前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东方天书——将军崖岩画

和画面,被考古学界称为“东方天书”,是江苏唯一现存的岩画遗迹。

无独有偶,连云港这块文化沃土,也有 2000 年前的简牍——花果山出土的汉代法律文书、东海出土的郡级行政文书以及帛书《神乌赋》。

1978 年出土于花果山砖厂的法律文书是中国简牍文献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发现;写抄于元寿二年(公元前 1 年),是现存有关汉代律令最早的实物见证;《汉书·刑法志》中关于“决事比”的量刑标准以及将案件上报到郡府等相关规定,在 2000 年后花果山的发现得到确认。

这种在竹木上写抄的传播方式在海州境内的发现已经有 16 批之多,其中最具价值的还有东海郡的行政文书,各类吏员簿、长吏簿以及名籍等行政文书,不仅是史书记录的物证,更重要的是,纠正了正史所存在的大体量的讹误,实证了汉代朐县在统计、执行吏员编制上的详确和严谨。这些地方政府的档案文献和刑事案件文书在墓葬里作为殉物,除了说明死者的身份外,也见证了当时通过写抄这种原始出版方式的文字流布,受到官方及民间的充分重视。

迄今为止,我们虽然不能确知宋、元时期海州是否有刻版印刷业的存在,但现存与海州相关的明版图书并不罕



见。尤其是地图制版技术的精细和高超,让有幸能得以一见原版的观者,惊叹不已。明代海州的绢本地图有海州图、赣榆县图、沭阳县图各一幅。这三幅地图均在绢底上彩绘印刷,长 51 厘米,宽 31 厘米。每幅图各有一份相应的图说,详细地注解地图所标出的内容,并且和地图合裱成可以对折的册页。从用“虎皮宣”纸作成托边的现状来看,这两幅图的最后一次装裱,当在清代末叶。地图上区别各种标记和图例的色彩清晰醒目。如土山、土墩用黄色;土城、堤坝用赭色;农田用草绿色;石建筑用白色;砖建筑用蓝色;房屋瓦顶用黑色;衙门、寺庙及公共建筑用红色;树木及山林用青绿色;海水用绿色粗波纹;河水、湖塘用绿色细波纹……甚至运用了状物摹景、立体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强调了城池、山脉、水面、水利、军事设施以及名胜古迹。对城池、军事要塞、山川也采用了夸张突出的手法。地图《图说》的文字记录也极具价值,据载,海州城池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开始用砖砌城”,并“有把总海州所防御之”。

《镜花缘》版权的诉讼,注定要走进中国文化史。道光元年(1821),李汝珍的《镜花缘》在苏州一家书坊刻印面世,然而,当这本史称“原刻本”《镜花缘》正在刷印之际,江陵桃红镇书坊根据李汝珍手稿传抄本付梓的抢刻本已经上市,李汝珍毫不犹豫地赶赴江陵官衙投诉。此项版权维护的案例提示了清代中叶海州乃至苏北地区的文坛已经具有鲜明

的版权意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出版业的行业规范和图书市场的活跃程度。

祖籍海州的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以及长期定居于海州的李汝珍撰写的《镜花缘》皆遭遇了争执激烈而持久的著作权公案。面世近 430 年的《西游记》和成书 200 年的《镜花缘》一经亮相就伴随着著作权的诸家论辩走进中国小说史和出版史。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文学史家,从大名鼎鼎的毛奇龄、陶宗仪、纪晓岚以及《元史·艺文志》执笔人钱大昕到鲁迅、胡适和郑振铎,都曾着力甚勤地发表论述,加之现代《西》学家长达半个世纪的论辩,相关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字纠结。《镜花缘》著作权也早已成为“公案”,只是论证的主要辩手多是海州人,肇始人是海州城十字街人吴鲁星,写出《镜花缘公案辨疑》专著,企望结案的是海州中正人、后任《江苏教育》编辑孙佳讯。当然,李汝珍的妻舅许乔林、许桂林兄弟的裔孙许绍籛早已在自己的文字中理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两部旷世经典版权、著作权的历史印痕,将是中国出版史不可或缺的章节。

清末民初的海州出版业依托于港口商埠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蕴集的书刊报业带动了刻字、制版、印刷的行业发展和快速的提升,商业中心新浦、背依港口的大浦和连云以及仰赖盐业经济的板浦、中正,涌现出一大批出版印刷业的店铺、作坊和工厂。已知这些店号和厂牌是:报纸印刷社、广智书报社、世界书局、刻板印刷处、宝华印刷局、振华印刷局、振东印务馆、普泰石印局、洪博雅斋刻字铺、灌华印刷厂、姊妹花印刷厂以及空心街陆文林印刷厂和徐镜溪担任经理的宪记书局……光绪年间的胸浦审安堂、板浦洪博雅斋以及民国二十一年(1932)新浦健华石印局的印刷产品,刻面清爽、布白停匀,插图的线条流畅俊朗。清末民初海州地区的制版、印刷技艺,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清道光《镜花缘》刻本插图



明清时期海州书院 兴起的成因初探

宋继奎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校类型。创始于唐代。宋至清为私人或官府所立讲学肄业之所。宋代由于官府奖励，书院大兴，最有名当为白鹿洞、嵩阳、应天、岳麓等有四大书院。不少学者讲学其中，形成不同学派的争鸣。元代增至二百余所，路府州皆设，然在官府控制下，渐流为科举的预习场所。明代由于在讲习中议论朝政，屡遭禁毁。清代发展至数千所。明清书院多为习举业而设。直至清末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为止。

明清时期海州一直文教不兴。其主要标志是占文教主流的科举考试中科名人数甚少。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疲敝。这在历任知州的眼中可见一斑。如明洪武初，首任知州陈德辅见到的海州城是“草莱”“荆棘”遍地；明后期隆庆年间知州郑复亨到海州履职时见到的仍是“榛莽极目，茅茨无烟。即民所至居为镇者，亦仅数家耳”，入城，“屋无鳞次，城西一带，颓垣可逾。谒先师庙，见殿庑倾圯，妥灵无所”；至明晚期天启年间知州刘梦松初到海州“入其境，见土地荒芜，阡里萧条。窃叹曰：东海古称名郡，今尔尔。予忝司牧，得无隐忧乎？”清代海州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因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文教自然难以发展，与人文荟萃的江南相比，差如云泥。

因此，以“修齐治平”为理想，以“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为己任的循良任海州知州时，除劝农桑恢复和发展以农为本的经济以完成课税外，便是崇文重教。在重修或扩建文庙学宫的同时，着力兴办书院和社学，以彰显政绩。

据史料，自明嘉靖二年（1523年）至隆庆六年（1572年），海州先后建有崇正、明道、石棚、伊卢、朐阳五所书院；清代建有朐山、石室、卫公、天池、郁洲、敦善、精勤七所书院；另赣榆建有怀仁、选青、湖沂三所书院；沭阳建有怀文、于公二所书院。

上述书院从起意兴建到有所成就，初步分析主要有如下因素：

一、一心兴学，公私并举

兴办书院的目的，正如清周萃元《怀仁书院记》所说：“以广朝廷兴学育才之典，化至洽也……可以卜英才之聚，教化之隆矣。”由是，官府都当作振兴地方文教、淳化民风的一件大事来抓。于是想方设法，勉力初创。

兴办书院首先要有场所，从何而来？主要靠因陋就简，“借鸡生蛋”。在海州首办书院的知州廖世昭于明嘉靖二年在城里观音寺创办崇正书院，在长安寺创办明道书院；嘉靖年间，海州人张瀛从淮安卫指挥僉事任上退休后，在城外石棚山石曼卿读书处建石棚书院；板浦生员时隆在伊卢山（今伊芦山）



石佛寺旧址建伊卢书院。知州廖世昭为这两所书院题写了匾额。明隆庆六年,知州郑复亨在儒学敬一亭创办胸阳书院;清乾隆五十三年,知州李逢春在蒲神庙重建胸山书院;嘉庆七年,知州唐仲冕在故明守御千户所公廨旧址,即州同街杨鼎盛所捐地基,建石室书院;嘉庆十年,大伊镇理问街王学导等重修乾隆年间知州卫哲治在新安、大伊两镇创建的卫公书院,知州唐仲冕为其题额;嘉庆七年原海州天池书院(乾隆年间由板浦、中正、临兴三盐场联合兴办)迁到板浦,更名为郁洲书院,未几年,被临兴场盐课司大使等借居三十余年,使书院徒有其名。为此,海州盐运分司运判童濂另行择地重建,于道光十七年建成,改郁洲书院名为敦善书院,同时捐赠图书一万三千卷,又在书院开辟射圃,建崇亭、文昌阁,俨然学宫规制,成为江淮闻名的书院;光绪二十五年,知州鲍毓东、海州盐运分司运判彭家骥、中正场大使陈汝芬联合在中正(今板浦中正社区)建精勤书院。

兴办书院要有经费,从何而来?主要靠官库支出、官员捐俸和乡绅捐赠。乾隆二十四年,知州李永书从库存余银中支出三百八十贯购买张姓房屋初建胸山书院;嘉庆七年,知州唐仲冕创建石室书院时带头捐出养廉银,下属赣榆、沭阳两县官绅也鼎力资助,终使书院告成。唐仲冕又将集资剩余款存入钱庄,每年取息七百五十两作书院日常开销,又划拨无主荒地十五顷多,取地租作补助开销;嘉庆十年,大伊镇王学导重建卫公书院时,并以四百两银存款取息作为延师教学之资;乾隆二十九年,沭阳知县钱汝恭捐俸扩建怀文书院(前身为厚丘书院),邑人富绅吴九龄捐助膏火(书院酌发给学员的津贴费用)银一千两,次年监生周光燕等捐钱三百二十千文;乾隆三十一年,富绅程开聚出资数千缗修建文庙和书院;同年,沭阳六塘河同知于中行捐资创建于公书院并捐膏火银;乾隆三十四年,沭阳知县倪学洙捐钱一千三百七十千文交董事生息,每月纳息钱二十七千四百文作怀文书院经费。每年师生修膳杂支不敷之数,由知县捐养廉银以足之;乾隆六十年,赣榆知县王城捐俸重建怀仁书院,同治

十三年知县吴英启又募资重修;道光二十六年,赣榆知县彭荣浩等募建造青书院,同治十二年士绅徐恩普等捐资重建;光绪十三年,赣榆知县王豫熙等捐资在沙河镇创建溯沂书院。

对于这些捐资办学的义举,官府除题匾额以资鼓励,还立碑记述创建和修建始末以纪功。如石室书院建成后,勒石于讲堂之东,将捐资人姓名和捐款数额一一刻于碑阴,昭示后人不忘。

二、选聘山长,延师主讲

古代书院设山长,除讲学并总领院务(乾隆时改称院长,清末仍称山长)。选聘山长首重德行和学问。“山长之称,人以为非实行粹学者莫宜居”,“无其实,敢处其名乎?”著名书院的山长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能在此讲学的亦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儒。如白鹿洞书院,南宋朱熹、明代王阳明先后执教于此;岳麓书院,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另一位是吕祖谦)曾讲学于此;应天书院,北宋名儒戚同文讲学于此,晏殊知应天府时,特聘范仲淹主讲其中,声名大振;嵩阳书院,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二程”程颢、程颐兄弟讲学于此。

因此,选聘山长和延请主讲实关乎书院的声望和教学效果。海州的书院亦沿袭此传统而延请品学兼优者任之。

如乾隆二十四年,知州李永书特延请宜兴翰林李英为胸山书院院长;嘉庆七年,郁洲书院由海州盐运分司运判邓谐(举人出身)任院长,专门“以课灶籍子弟”;嘉庆十七、十八年,板浦大才子许乔林曾任郁洲书院山长;道光十七年敦善书院建成,经知州唐仲冕提议,由许乔林出任山长,“主敦善书院之讲习者,前后将二十年。”同时聘请当地的举人和知名学者如“中正才子二乔”(乔绍乔、乔绍傅昆仲)、“板浦名士”吴振勃及一些流寓学者等担任教授;光绪二十一年,海州著名实业家沈云沛曾在此掌教(据姚祥麟《板浦春秋》);清末状元南通人张謇于会试前曾任赣榆选青书院山长数年;同治年间沭阳知县张光甲重修怀文书院并请乡贤学者李肇寅掌教,颇受诸生欢迎;光绪五年知县杨凤朝廷请著名学者王诤为怀文书院主讲,诸生慕名纷至沓来,



进士张庚铭、李映庚皆出其门下,由是书院声名大振。

于此同时,知州知县有时也会去书院讲学。封建社会的官员一般都是经应试得科名而入仕的。知州知县通常是进士或举人科甲正途出身。他们都精熟儒家经典,有的有诗文集付梓,有的还主持纂修了州志、县志。因而他们去讲学当之无愧。知州唐仲冕(乾嘉学派知名学者,总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就在其初创的石室书院亲为主讲,俟经费充裕即以厚币延师,先属学正翁咸丰任山长,讲义评文,训导周充为监院,并分别给以教学酬金。

三、因材施教,奖优励进

书院的学员与儒学的生员不同。明清时代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名生员,习惯上称秀才。他们经常须受本地方教官及学政(明代为学道)的监督考核。明代的生员最初每月都给廪米补贴其生活。清代则须经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生名义。

而书院的学员则可以不限身份、年龄、资质、籍贯,有生员,也有童生(明清科举制度凡应考生员之试的不论年龄大小皆称童生),著名的书院甚至有进士去受教的。但为杜滥,书院亦须由监院出题目考试以决定是否录取。并根据录取者的不同水平,因材施教。如石室书院分为上课、中课、副课、外课;赣榆怀仁书院分为内课、外课;敦善书院的学员分两类:一类是录取的童生,入院研读以备应州试或备考生员,因长年在院攻读,称“童生长课”;另一类是附学生员,书院定期开设讲会,他们每月若干次来院听讲,并请教授批改八股文等诗文,准备应乡试,称“文生月课”。书院学员以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教师或予以评点,或引而不发以启发学员思考,或反复进行质疑诘难,或师生各抒己见进行辩论。总之是以灵活多变的方法深入进行学习研讨,目的是应考,“挤”入仕途。据资料,也确实从书院走出了一些秀才、举人甚至进士,有的还成为著名学者。曾在精勤书院求学的卞赓成为清

末的一位武状元。他也是海州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可谓空前绝后。状元府就在精勤书院隔壁。

书院还对学员在生活上给予补助,对学业优异者予以奖励。如石室书院对学员“优以膏火(生活补贴)、奖以花红(犒赏奖金)”;郁洲书院“束修(教师工资)膏火,岁有常规”;怀仁书院“人月分廪粟若干,奖异(优异)若干,贍给以时,旌赏(表彰赏赐)维公”。

海州原来没有试院,生童要长途跋涉到淮安府参加岁、科考试。嘉庆十年,知州唐仲冕为生童着想,集资在石室书院增建号房(考棚)八百五十间,申请省学政到海州来主持考试。岁、科两试期间书院作为试院,考试结束仍为书院,一举两得。道光十八年,知州王用宾又增建号房四百三十间。至此,石室书院可容纳千余人就近参加考试。

四、择以佳名,拳拳服膺

给书院起名字,是兴办书院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本文不可或缺的话题。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给人或事物起名,往往寄托着起名者对其殷切的期望或某种导向,也会对人起着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促其为达成目标而努力。海州的书院创建者为书院起名,亦可窥见其良苦用心。

除以书院所在地的朐山、伊卢、郁洲、朐阳、怀仁、怀文等为书院名之外,其余均有含义:

崇正书院:崇正即崇尚正道。儒者的正道即孔孟之道。班固《东都赋》:“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又“正”为正身。为人须正直、端正,不可偏邪。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子·立政》:“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故以“崇正”名书院。

明道书院:明道即申明道理。儒家申明的“道”,即仁义、礼乐、忠恕、中庸;政治上主张的以礼义廉耻为治国四纲;道德上主张的以仁义礼智为四端,孝悌忠信为四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孟为道统,继承发扬之。故以“明道”名书院。

石室书院:以石室、石棚名书院,都是因景仰北宋大文豪、州判石曼卿在海州石棚山筑室读书,抛泥种桃,超凡脱俗的风骨情怀所致。

敦善书院:敦有亲身勉力从事之义,又有督促之义;善的基本义项是善良、友好。陶渊明有句:“匪善奚敦?”“敦善”谓学员须勉力从善,待人处事须睦友善。

精勤书院:“精勤”谓专心勤奋。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谓学员须刻苦努力,精勤于学业,不苟且随便;戒荒怠,做事不加思考。

选青书院:“选青”由“青钱万选”一词衍化。“青钱万选”喻文才超众,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新唐书·张荐传》:“鸞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宋晏殊诗:“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以“选青”名书院,谓对学员寄予厚望,能文才出众,科举得中,金榜题名。

选青书院留有张謇的一副对联,值得一提。光绪十三年,张謇应赣榆士绅许恩普等人礼聘,辞去开封府幕僚,到选青书院任山长。其间多有识者求其书作。光绪二十年,张謇在赴京应试之前曾撰书一联留给选青书院作纪念,联曰:“地临齐鲁大地,愿诸生绍述儒林,广为上郡培杞梓;客走江淮男子,笑十载驰驱幕府,又来东海看涛山”。此联描述了自己的飘泊生涯,抒发了郁郁不得志的散淡情怀,同时勉励诸生继承儒学,列于儒者之林,培养成为进京应试的优秀人才。据说此联书法遒劲苍洋,风意高古,为难得珍品。然謇时未显贵,此联未被接收对联的庸夫所重。及至謇高中状元,魁甲天下,其书作自然身价百倍。此时庸夫才将弃置损坏的对联小心翼翼地找出,请能工巧匠精心装裱,并镂金于会文堂抱柱上。会文堂因此大增异彩,观者不绝。赣榆因此联而使乡梓增辉。

溯沂书院:溯本义逆流而上。引申为追根求源。溯沂来源于“浴沂”。《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叫他们谈各人志向。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只赞赏曾皙的主张,因为他用形象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了“仁”和“礼”的治国原则。后世以“浴沂”喻一种高尚的情操。以“溯沂”名书院,是希望学员追溯先哲的理想和情操,具备高尚人格,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

怀仁书院:赣榆县于北朝东魏武定七年置为怀仁县。金大定七年复改赣榆县。虽以怀仁县名名书院,但本源于孔子的仁学。《论语》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因此,以“怀仁”名书院,是希望学员常怀想仁人之教,以仁德存心,做一个志向高远的仁人。

怀文书院:北朝东魏武定七年置沭阳郡,下辖怀文等四县。北周建德七年改怀文县为沭阳县沿用至今。虽以怀文县名名书院,但其本源于孔子的论“文”。《论语》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以“怀文”名书院,是希望学员虚心好学,广求学问,恪守礼法,举止斯文,态度闲雅,这样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由此可见,上述书院的名称实寄托着对士子们的殷殷厚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海州的有关官员和士绅,在地方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崇文重教,克服困难,勇于担当,努力兴办书院,为培养儒家知识分子,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延续地方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地方文教史上应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作者通联:国大国际花园 16#-1-605)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常被写错的几个历史人物姓名

张卫怀

在第一轮编修的《连云港市志》和有关的县区志中，在大量的宣传介绍连云港市的文本中，在一些文人学者的有关文章中，甚至新闻媒体的稿件中，我市的几个历史人物的姓名常常被写错，应该引起注意，予以纠正。

钟离昧：常常把“昧”写成“昧”，如第一轮《连云港市志》第2627页。《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昧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麋竺：常常把“麋”写成“糜”，如第一轮《连云港市志》第2627页。《三国志·蜀书·麋竺传》：“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货产钜亿。子威，官至虎贲中郎将。威子照，虎骑监。自竺至照，皆便弓马，善射御云。”又有关于麋威的记载，“麋威，字不详，徐州东海郡朐县人。活跃于东汉末年至蜀汉中期。祖辈世代经商，家中仆僮门客多达万人，资产数亿。父麋竺，字子仲，东汉末年为徐州别驾从事，仕蜀汉官至安汉将军。叔父麋芳，字子方，仕蜀汉官至南郡太守，降吴后官至将军。其姑麋氏为蜀汉昭烈帝刘备妾室。麋威有乃父之风，相貌雍容华贵，精通箭术与马术，擅长骑射征战。自幼随父亲跟随刘备转战南北，蜀国建立后，赏赐优宠。后主建兴年间，官至虎贲

中郎将，统领虎贲禁兵，负责中央宿卫，秩比二千石。子麋照，也便弓马，善射御，官至虎骑监。”今人在麋竺井边所立的石碑上书写“糜竺井”显然是错误的。

裴天佑：常被写成裴天祐，如《连云港市志》第2629页。《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五五二记载，裴天佑于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癸亥晋列卿，为大理寺少卿。在裴天佑的墓志铭中，在他校正的《隆庆海州志》中，都是用“佑”。

李普元：有的写成李晋元，如《连云港市志》第2667页。他曾经增修《东海志》，可惜未见存世。

沈云沛：常常被写成沈云霈，如《连云港市志》第2633页。沈云沛是清朝名臣，海州名士，其名误作“沈云霈”几十年。清季海州张恩沛的《夔序录》、相才的《朐阳纪略》中，有关沈云沛的记述和沈云沛亲自撰写的《序》，都是写为“沈云沛”；同治十二年，沈云沛乡试第五十名举人的具结，光绪二十年恩科而中贡士、复试、殿试名册等，均作“沈云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馆藏档案，包括光绪、宣统皇帝之朱批、上谕、军机处铃章、沈云沛的奏折，国家图书馆馆藏沈云沛著作等等都作“沈云沛”；1919年9月，沈云沛在天津逝世，《京报》所刊讣告也作“沈云沛”。

卞赓：有时被写成卞庚，如《连云港市志》第2635页。清朝自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共取中武状元109名，其中卞赓为第106位，中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姓名是一个人的记号，是涉及名誉和行状的严肃事情。书写姓名确须认真，不可似是而非，无论形近音近而误，皆不是理由；人云亦云，不加精审考究，以致造成以讹传讹，也是对斯人、对历史的不恭敬。

（作者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编辑 于冰清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八)

——魏晋时期连云港地区政区建置沿革

刘凤桂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 51 年的短暂统一外,至隋文帝公元 581 年重新统一,中国历经了三百多年分裂的历史。这个时期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彼此疆界变化反复,连云港地区的政区建置呈现复杂的情势变化。厘清这一时期连云港政区地理变化的来龙去脉,对研究隋唐以后海州的州郡建置和县一级的行政运作是很有意义的。

三国魏晋时期较之与东汉末,连云港地区的郡县隶属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三国曹魏黄初六年(225),废利成郡归东海郡,以祝其、利成复归东海郡。据《三国疆域志》:“东海郡,汉置郡,魏黄初中(220-226),作国,领县十一。”所谓“作国”,乃是说曹魏时仍袭汉末旧制,为东海国。关于曹魏时的赣榆,《宋书·州郡志》曰:“赣榆县,魏省。”所谓“魏省”,是继续东汉献帝建安三年(198)“析利成、祝其建利成郡,废赣榆”的建置,随利成一起归入东海国了,所以赣榆未见地理书所载。三国曹魏时东海国属徐州,郡下领朐、襄贲、厚丘、利成、祝其五县。今灌云、灌南地区称海西县,时属广陵郡;曲阳(今海县南部)属下邳郡。

晋废东海国复东海郡,连云港地区隶属的州郡域境无大变化。据《宋书·州郡志》赣榆县于“晋太康元年(280)复”,即恢复了县的建制。晋惠帝太安二年(330),北方始乱,但战火只是在中原一带,连云

港地区仍归属西晋的徐州东海郡。西晋时期,东海郡属徐州,辖朐、襄贲、厚丘、利成、祝其、赣榆六县。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并为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动乱分裂埋下了祸根。所谓“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北方少数民族,“十六国”是这些少数民族上层在中国北方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建立的割据政权。但这些政权势力范围在西晋一朝并未达到徐州东海郡一带,如公元 304 年,最早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人刘渊的汉国,其割据范围仅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西部等一带。

东晋的建立及南北对峙局面下,连云港地区政区地理又有了新变化。据《宋书·州郡志》:“晋元帝初(317),割吴地海虞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成,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清《嘉庆海州志·沿革》谓之:“盖东海郡所领七县尽入于后赵、南燕矣。”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部分论证,时后赵、前燕、后燕、前秦政权于公元 319—410 年期间曾先后占据西晋时的东海郡域境。然而,郁州岛情况则有所不同,此一系列海中山岛从西晋到东晋,直至南朝梁临贺王太清三年(549),侨立于郁州岛的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于(东)魏,才结束了南朝政权统治的历史。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以免有误:东晋初年侨立朐、利成的“海虞北境”地在今江苏常熟市北,临长江的一处



地方,时属吴郡(今苏州)。祝其、襄贲等县寄治的曲阿,地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

早在“八王之乱”之后,面对西晋政权危机四伏的情势,具有政治眼光的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旷、王敦就向时任平东将军、督徐州诸军事、驻守下邳的琅琊王司马睿提出将实力南移,经营江左,以备危局的建议,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并被执掌朝政的司马炽认可。永嘉之乱(311),西晋的豪门大族纷纷逃避江南,史称“衣冠南渡”,司马睿收容安置他们,从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是为东晋。

东晋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包括徐州东海郡、琅琊郡在内的北方大片土地治权的丧失。淝水之战(383)后,苻坚的前秦分裂瓦解,公元393年为西秦所灭,东晋乘机收复一些失地,安帝义熙中刘裕北伐于义熙六年(410)灭南燕,十三年(417)灭西秦。东晋遂以黄河与北魏为界,置北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朐、利成、祝其、襄贲等东海郡原属地得以恢复。

东晋与十六国对峙期间,与郁州岛隔海相望,以朐县为代表的大陆部分,由于经历后赵、前燕、后燕、前秦、西秦、北魏等六个少数民族政权近百年间的征战攻伐,割据更迭,造成民生不安。社会经济发展缓滞。县以下的封建政权大都瘫痪瓦解。西晋以来的坞堡自卫制度得以发展,“修壁垒,树藩障”,坞堡内部建立“上下有礼,少长有仪”(见《晋书·庾亮传》)的封建统治秩序,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坞堡主“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擅为奸究”。(见《晋书·慕容德载记》)对动乱中失地或逃亡的农民来说,可以相对安稳地在坞堡里从事农业生产,但人身依附关系下又要提供高额地租和缴纳赋税,并无偿服劳役,这无疑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行政与军事合一的宗主督护制度,实际上起了替代地方政权的作用。如我市的锦屏山一带(时称朐山)当时就有这种坞堡存在,至南北朝时期,其作用更加明显。

相比之下,郁州岛因为近百年在相对稳定的东晋政权统治下经济得以发展。郭璞注《山海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这是典籍中首称郁州者,向有渔盐之利。其时,郁州与建康之间有海路相通,据

《晋书·孙恩传》《宋书·高祖纪》,东晋时孙恩起义军于隆安五年(401)六月,从海岛(舟山群岛)浮海进至丹徒(今镇江东)威胁京师,因东晋有备,转而过江长北上先破郁州后广陵(扬州),此证明建康—广陵—郁州有一条海上通道,有近海海路可供海船航行。在淮河以北地区尽属前秦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局势下,这无疑是郁州与东晋经济、文化中心区联系的唯一交通。这一海路还可通过长江与今浙江南的吴郡地区发生联系。郁州成为保卫东晋核心地区的海上屏障,故东晋政府必下大力气经营。地下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今云台山就曾发现过东晋时期的酱釉鸡首执壶、青铜天禄一类文化遗物,并多处发现东晋时期的生活器用陶片。

公元398年,鲜卑拓跋珪称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太原),史称北魏。北魏初年无力南下对付西秦,东晋刘裕北伐于公元410年灭南燕,连云港地区归入东晋建置范围。东晋于公元417年灭西秦,与北魏以黄河为界各领疆土。公元420年,刘裕以禅让方式取代东晋王朝,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综合以上所述,北方十六国至北魏初期连云港地区先后属后赵、前燕、后燕、前秦、西秦。

梳理三国(魏)西晋和东晋十六国时期连云港地区的政区建置概况如下:

三国(魏)时期:域境内建置有朐、襄贲、利成、祝其、厚丘五县,属徐州东海国。时间跨度为公元220—280年。

西晋时期:域境内建置有朐、襄贲、利成、祝其、厚丘、赣榆六县,属徐州东海郡。时间跨度为公元265—316年。

北方十六国时期:先后属后赵、前燕、后燕、前秦,隶属徐州东海郡,域境内建置有朐、襄贲、利成、祝其、厚丘、赣榆六县。时间跨度为公元317—410年。

东晋时期:属恢复后的北徐州的东海郡,域境内建置有朐、襄贲、利成、祝其、厚丘、赣榆,时间跨度为公元410—420年。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朐海书院)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港城首次表彰模范教职工

——从一张 65 年前的老照片说起

韩世泳



新海连市 1950 年度全体模范教师合影

这是一张距今 65 年的老照片，是一张记录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尊师重教的非常宝贵的老照片。照片上方印有“新海连市一九五〇年度全体模范教师合影”，合影时间是“1951.8.23”。也就是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年头新海连市表彰的模范教师（从人员构成上应该是模范教职工）的合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连云港市首次表彰奖励的模范教职工，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老照片。

（一）

这张老照片，是十多年前笔者在参与新浦区首轮修志期间，向有关老同志征集资料时，市文联原副主席夏兴仁同志提供的。夏兴仁同志是灌云县人，解放后毕业于中共鲁中南区新海连特区建国学

校。1949 年 6 月被分配到新海连特区专署文教科工作。后来一直在市文化部门工作，可谓连云港市教育文化界元老。当时，他还提供了几张同期全市教师暑期学习学员合影照片。因这都是全市教师活动资料照片，照像地点又在海州城内孔庙里，《新浦区志》没能录用。

但是，我对这张照片十分珍惜，因为夏兴仁同志把这张照片往我面前一放，我就觉得照片上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仔细一看，这些熟悉的面孔中，有住在我家西边，后来担任我小学母校——中大街小学校长的王新楠；有我小学时的周建新、余玉英、乔敦枢老师；有我小学、初中同学刘兆元的母亲冯素芳老师；还有我

上小学时学校工友（当时学校负责上下课打铃等勤杂事务的职工都称“工友”）倪培华和家边邻居伏大哥（后得知他叫伏建中，为解放路小学工友），几乎占到照片上人物的一半。我得此照片如获至宝，马上予以翻拍，留存，将原件奉还夏兴仁同志。

（二）

照片翻拍后，笔者便着手对照片中的模范教师、模范工友，包括我认识的人，进行全面了解。首先请教夏老，但因他在当年参与办教师暑期培训班后不久就被调到文化部门工作，时间长了，照片中好多人的姓名、工作单位等具体情况也记不清了。我便又请教曾任新浦区文教科科长、新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新浦区关工委主任的孟宪凯同志，



他帮我辨认了几位教职工。后又拜访新浦区文教科老科长刘永生同志和曾任新海区、海州区文教(教育)科副科长的武逸之同志和部分老教师,终于弄清了照片中10位模范教师、5位模范工友中其他8人的姓名。为让我市首批模范教师、模范工友名扬后世,便按“模范老师”和“模范工友”分前后排将他们姓名注册于照片下:

十名模范教师为:冯素芳(前左三)、张子欣(前中四)、杨志仁(前右三)、余玉英(前右二)、陆从卿(前右一)、乔敦枢(后左一)、孟宪达(后左二)、周建新(后左三)、张海清(后右四)、王新楠(后右三);

五名模范工友(照片中穿白色工作服者)为:伏建中(前左一)、张名江(前左二)、倪培华(后左四)、张立云(后右二)、卞家生(后右一)。

照片中人物姓名搞清后,我又到照相馆将其洗刷几张,并将人名也一一对号印于照片下边。记得当时我多刷了两张,分别赠送给老校长王新楠和冯素芳老师长子、我的老同学刘兆元。他们见到后都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后来听说,刘兆元又将照片翻印几张,分给每个弟妹,留作纪念。

(三)

我市首批模范教师、模范职工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得从头多说两句。

古海州地区教育事业虽历史较长,民国前兴办过多座书院,清末民初也开始兴办学堂(俗称洋学),还办了中学、师范,但总体而言教育事业还是发展滞后,不甚发达的。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期间,侵华日军出于狼子野心,进行奴化教育,中华民族传统教育受到摧残。抗战胜利后,只说教育能有转机,又遇国民党发动内战,将海州人民推于水深火热之中,海州地区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加之国民党败退前夕大肆造谣,部分师生被欺骗、裹挟随其西撤。在空城期间,域内学校全都停课,有的学校还遭到哄抢。1948年11月7日,解放军进城时,新(浦)海(州)连(云)中小学全部关门,全无读书声。

解放军进城当天就宣布成立新海连特区,第三天,特区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新浦成立。军管会主任谷牧带领大家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于当

日在新浦天后宫内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工商企业恢复生产,恢复营业,学校恢复上课。同时,组织人员深入原学校教干、教师家中耐心宣传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消除思想顾虑,团结一批积极分子,做好具体工作,发动群众将散失在社会上的课桌、板凳、教具及教室门窗等收归学校。特区政府把恢复教育和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看得同等重要,使教师们看到了希望,消除了顾虑,很快都回到学校,投入“复课”各项准备工作。当月下旬,新海连地区中小学全部复课,教学秩序很快走向正常。

为了使广大教师、职工跟上形势,不断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从第二年即1949年暑期开始,每年暑假都举办全市中小学教师集训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同时也总结教育、教学工作,交流经验,明确新学年工作任务。当时,全市只有61所中小学校、400多名教职工,就集中在海州中大街小学(先称新海连市第四完小,后为第一完小)校内(即儒学,也称孔庙)进行学习。1950年起,中学教师改由临沂专署组织集训(新海连市时属山东省临沂专署管辖),暑假期间中学教师集中到临沂去学习。小学教师仍在海州孔庙里学习。经过两年的工作、集训,教职工队伍趋于稳定。为了激励广大教职工从事人民教育的积极性,1951年暑期,市文教科在海州孔庙举办“暑期教育研究会”,各小学校工友也参加学习。研究会除进行教学研究,交流经验外,还对1950年度学校工作进行总结,首开评比表彰活动,评选出了港城有史以来首批10名模范教师和5名模范工友,并为他们戴大红花,发奖品。在旧社会,教师收入微薄且无保障,社会地位也很低,人称“小孩王”,自古有“家有隔宿粮,不做小孩王”之说。共产党、人民政府重视教育,尊重教师,还在办教育研究会期间评模范,戴红花,发奖品,这是老教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为此,“研究会”主办者为评选出的模范教师、模范工友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方注明是“新海连市一九五〇年度全体模范教师合影”,摄于“1951.8.23”,更得夏老有心保存,便留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老照片。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郯子国”考

王 滨

追溯连云港历史时，现代许多记述中都提到“郯子国”这一名称。首部《连云港市志》载：“海州，春秋时为鲁之东境，为郯子国”。连云港本地出版的一些史书和志书也纷纷沿用这一表述。这个表述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春秋时为鲁之东境”，一是“为郯子国”。唐代杜佑《通典》、北宋《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都提到了海州为“春秋鲁国之东境(界)”。之后众多的志书都沿用这一说法。明隆庆《海州志》“海州本春秋郯子国地”。今人将两处史料合二为一形成“海州，春秋时为鲁之东境，为郯子国地”。

笔者以为这种表述存在两处疑问，需要商榷。

首先，历史上有“郯子国”吗？

其次，“春秋时为鲁之东境(界)，为郯子国地”里的“境”是指境内还是境外，也就是“郯子国地”属于鲁国还是不属于鲁国。

历史上有无“郯子国”

“郯子国”这一名称有两个出处，一是目前网上流传的“郯子国”，一是古代史书中记载的“郯子国”。

网上有如下三点关于“郯子国”的叙述：一是“郯子国”是因为一位叫“郯子”的人而成立；二是成立于战国时代；三是成立于今天的沭阳一带。因为大家崇拜“郯子”的学问和人品，所以纷纷聚拢在其附近学习生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邦国，之后大家推选“郯子”为这一国家的首位君主，其国也命名为“郯子国”(按照如此说法准确表述应为“‘郯子’国”——笔者注)。

上述网上流传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尚可，但作

为历史则纯属无稽之谈。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以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周代分封对象包括先代圣人之后、功臣、周王室成员以及本来存在的诸侯如徐、越等被周天子认可。除此之外还没有因学术道德而受封为诸侯的事例。

历史上“郯子”确有其人，但史书上的“郯子”又不是专指一人，他是郯国国君的通称。周代是一个非常讲究礼制的时代，汉语中的“礼数”一词即从此而来。其在称谓上是非常讲究的。周制，列国诸侯非夏殷之后，其爵没有称公者，大夫虽贵，不敢称子。周初，只有周天子才称王，其他的诸侯等级再高也不能称王。宋是公国，其君主称“宋公”。以此类推，齐是侯国，其君主称“齐侯”，郑是伯国，其国君称“郑伯”，郯是子国，其国君称“郯子”，许是男国，其国君称“许男”。但到了西周末年特别是春秋开始后，由于周天子势力的衰落，诸侯开始纷纷越级用礼。表现在称谓上，个别的国家比如楚、徐、越等甚至开始称王，其他诸侯国国君纷纷称“公”，比如齐桓公、晋文公、鲁隐公、郑庄公、秦穆公、许庄公等。但鲁国史书《春秋》严格遵守了周礼。《春秋》在记述诸侯国的国君时，继续遵循原有诸侯等级称号，比如宋公、齐侯、郑伯、郯子、许男。但如果是连谥号记述某一国君时则采用诸侯国的自称了。比如“齐桓公”“晋文公”“郑庄公”“许庄公”等。绝不会出现“齐公”“郑公”“郯公”这样的称号。当然鲁国史官还是



加了点私心在里面,对本国国君的记述不管加不加溢一律称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春秋》中提到的“郅子”都是指郅国国君,这里的“子”和孔子、老子的“子”不是一个意思,它是郅国国君的爵号。

从春秋开始,诸侯之间开始不断兼并,成百上千的诸侯渐渐减少到几十个以至到最后形成战国七雄。在兼并战争日趋白热化的战国时期,中、小诸侯国只有等待被吞并的份,这一时期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新生诸侯。战国时期有“新生”诸侯,比如“韩”“赵”“魏”,但这是老牌诸侯晋国被权臣瓜分而形成的“新”诸侯,日薄西山的周天子只能给予承认。“三家分晋”也被史学界作为春秋和战国的交接点。这一时期,老牌诸侯被内部权臣篡权的还有姜太公的齐国被田氏取代,戴氏代宋等,只不过都是一对一,原有国号继续沿用。而晋国是一分三,原有国号寿终正寝,催生了三个“新”诸侯国。不管是瓜分晋国的韩、赵、魏还是田氏代齐,这些“新”诸侯都是原有诸侯内部统治者改换门庭,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新诸侯。这时的周天子已经完全丢失了掌握天下的能力,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发号施令了,有些诸侯甚至和周天子开始兵戎相见。周天子怎么可能分封一个崭新的诸侯。其他诸侯又怎么可能允许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或者卧榻之侧新生一个诸侯。

所以不管是从产生的人物还是产生的时代来看,上述有关“‘郅子’国”的表述都是不成立的。至于说“‘郅子’国”产生于沭阳一带也就没有论证的意义了。《沭阳县志》中根本就没有“郅子国”的记载。

所以网上所说的“‘郅子’国”是不存在的。

“郅子国”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郅,故郅子国”。而早于《晋书》的《汉书》在记述海州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时明确表述为:“郅,故国”。隆庆《海州志》之后的康熙《海州志》中也明确将隆庆《海州志》中所提“为郅子国地”修正“为郅国地”,由此可以证明“郅子国”即是“郅国”。

连云港地区在周代曾经出现了许多诸侯国,但都是小国,影响力都不大,郅国是其一。

《春秋》记载鲁昭公十七年,“郅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郅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由此我们知道,郅国的祖先

是黄帝之子少昊氏。郅国属于先代圣人之后被分封的那类诸侯。有说其是宋国的附庸,但可以享受爵位,到底如何,我们这里不作考证。但从周代通常的分封来看,附庸国君是没有爵位的。反过来讲有爵位就不可能是附庸。郅国是以今天的郅城为中心的一个诸侯国,属于“公侯伯子男”五级中的第四级“子”爵国。郅国在春秋时期实力较弱,常常被周边诸侯袭扰,故而要寻求周边大国特别是鲁国支持以求得自存。

公元前414年,越国国君朱勾率军灭郅,俘虏了郅国国君“郅子鹄”。后楚灭越,郅为楚所有。

从武王封国到公元前414年,越灭郅,郅国历经六百余年。

“郅国”属于周代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中的第四等即“子国”。《晋书》及明隆庆《海州志》中提到的“郅子国”其本意应为“‘郅’子国”而非“‘郅子’国”。其中“子国”应是对“郅”的进一步解释即“郅,子国”。

那么既然“郅子国”和“郅国”所指是一个地方,是不是说这两个名称都可以使用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先秦史书尤其是《春秋》《左传》中提到“郅子”都是指郅国国君,没有一例把“郅子”当作国家来记述的。早于《晋书》的《汉书》也明确使用了“郅国”的概念而没有使用“郅子国”的概念。

其次,《晋书》最早使用了“郅子国”这一概念,但之后多数史书并未采用这一说法。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又开始出现这一说法,例如《读史方舆纪要》以及隆庆《海州志》。然而对隆庆《海州志》进行重新修订的康熙《海州志》却没有沿用隆庆《海州志》中的“郅子国地”,而是修正为:“海州,古郅国地”。此外,嘉庆《海州志》、《江南通典》等志书也均未采用“郅子国”的说法。也充分说明了后世学者不认同“郅子国”这一称呼。

我们在众多的古代史书中看不到、在今天大量的历史研究丛书中也看不到“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等类似对周代诸侯国的称呼,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郅国”是小国而随意给其另起别称,将其爵位连称“郅子国”显然是不合常规的。

再者,先秦史书中提到“郅”即是指“郅国”,提



到“郯子”则是指郯国国君,如:鲁宣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鲁宣公十六年“秋,郯伯姬来归”、鲁成公七年“吴伐郯。郯成”、鲁成公八年“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鲁襄公七年“郯子来朝,始朝公”、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鲁哀公十年“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郟”等等。没有一处出现以“郯子”作为国家名称的事例。

另外,周初分封的诸侯在之后的兼并战争中开始不断减少,到春秋战国时已经从传说中的八百到了十几个以至最后几个大国。诸侯虽然灭亡了,但他们的国号却在之后的历史中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下来,或成为一个地区的名字,或成为国人的姓。郯国灭亡后,“郯”的名称在这一地区陆续沿用,出现了郯县、郯郡以及现在的郯城这样有着历史传承的地名。而从未出现过“郯子县”“郯子郡”“郯子城”这样的地域名称。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郯子国”这种称呼违背了一个重要历史常识,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恶“二名”的现象。

《春秋公羊传》:“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就是说儒家认为名称中存在两个字是不符合礼制的。“二名非礼”,一直到三国时期都是如此。我们在看三国时,几乎看不到双字名的历史人物。人名如此,地名同样道理。所以,讲到诸侯国时,连带爵位一起称是违背当时的常理的。

“郯子国”这种称呼或许是作者自创,或许是印刷时因为没有标点而将“郯,子国”连写,后人误读。总之,“郯子国”的名称凸显另类。

个别学者甚至认为“郯子国”不是国名,是鲁国的一个地名,那就更显得另类了,二名都非礼,更不要说三名了。这在崇尚礼法的周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更不要说是在对礼法给予最高重视的鲁国地域上。所以我们可以摒弃“郯子国”地名说。

综上所述,笔者觉得重新编修的连云港地方志在追述连云港历史时,不应再继续使用“郯子国”这一怪异名称,而应统一使用“郯国”这个规范名称。

“海州,春秋时为鲁之东境,为郯子国地?”

首先这一判定并不常见于史书,史书和志书多数情况下单一判定或“春秋时为鲁之东境”,或“为

郯(子)国地”。

《汉书》:郯,故国。

《晋书》:郯,故郯子国。

《通典》:春秋及战国为鲁之东境

《太平御览》:春秋鲁国之东境。

《读史方舆纪要》合二为一,但顺序是“为郯子国地,后为鲁之东境”

如何理解“春秋时为鲁之东境”?

唐《通典》、北宋《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都提到海州为“春秋鲁国之东境(界)”,但没有后面的“为郯(子)国地”。

这样解释就会造成矛盾,即是鲁国的东部地区,怎么后面又加上一个更准确的定语:“为郯子国地。”一个地区又是鲁国的地盘,又是郯国的地盘。这显然是矛盾的。

历代史书和志书对于海州这一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归属判定不完全一致,大致分四种判定。

第一种是明确判定海州为郯(子)国地。

第二种是模糊判定为鲁之东境。到底是境内还是境外,这里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当然还有个个别史书画蛇添足加了一句“后属秦”,这一判定等于废话。秦统一了全国,不属于秦还能属于什么。如果说属于统一前的秦,一个在最西,一个在最东,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属不到一起去。

第三种是双重判定海州为鲁之东境,为郯国地(界)。

第四种《春秋大事表》:海州为莒鲁二国地。

由于海州地区在先秦时期处于东夷蛮荒地区,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少,今天已经很难对其准确的归属沿革作一个论断。只能是根据史书的记载进行符合历史规律的模糊判定。

先看第一种判定即海州古时属郯国,这一判定没有分歧。在各类史书和志书中基本上已经趋于一致。只有《春秋大事表》有点出入:海州属莒鲁二国地。

第二种判定“为鲁之东境(界)”。有两种理解:一是“位于鲁国东部(属于鲁国)”,二是“位于鲁国以东(不属于鲁国)”。不管属于还是不属于鲁国,从方位上来看确实是在鲁国的东部。

问题就出在第三种判定:为鲁之东境,为郯(子)国地。这里的鲁之东境就只有一个解释:那就



是鲁国以东。因为这一地区不能既是鲁国的,又是郯国的。

但也有认为“郯国”是鲁国的附庸(《郯城县志》),所以郯的领土就是鲁的领土,所以“为鲁之东境,为郯国地”可以解释为鲁国东部。

事实到底如何呢?

历史上郯国并不是鲁的附庸。

《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周代诸侯分五级,即“公、侯、伯、子、男”,公国等级最高,其中宋国最为著名;侯国最多,所以后来泛称各级诸侯国为“诸侯”,我们熟知的齐、鲁、晋、卫、燕等国都是侯国。伯国代表国家有郑国,子国有楚、莒、郯等国,男国较少,见诸史书的有许国。五级诸侯之外还有一级“准诸侯”,附属于周天子或者其他的诸侯,称为附庸,其最高领导称号为“君”,秦最初即为附庸国。

我们从上面对郯国的历史记述中知道郯国到了春秋时期比较弱小,但弱国不等于附庸国。“附庸”这个概念在先秦时代不是随意所指的,它具有特定的内涵。一是列于五等诸侯之外,二是规模不超过五十里,三是附属于周天子或者其他诸侯。

这里不作更多的辨析,仅从以下几方面简单说明郯国和鲁国并非附庸关系。

郯国国君称“子”,属于五等诸侯中的“子国”,爵位虽然低,后期实力虽然弱,但还是五等诸侯,并非等外附庸。

其次,我们在《春秋》第一章“鲁隐公”篇即可看到对附庸国的相关论述,“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注解中提到:邾是附庸,其君并没有被周天子直接分封,所以没有爵位,直接点名。而到了后来,邾的君主因为服侍齐桓公而受到了齐桓公的嘉奖,齐桓公为邾君向周天子索要诸侯封号。周天子这才授予邾君“子爵”,这时邾才正式成为诸侯。而《春秋》一书中多次提到了郯国,但没有一处提到附庸关系。而且提到郯的国君主都是以“郯子”相称,没有一处是直呼其名的。

《春秋左传注》宣公十六年:“郯伯姬来归,出也”。对此,著名学者杨伯峻作了如下说明:“鲁伯姬盖嫁于郯国之君而被弃并遣回娘家者。”当时诸侯

之间的婚姻都是政治婚姻,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周代,鲁作为一个大的诸侯,怎么可能把女儿下嫁给附庸。作为一个附庸,“郯子”又怎么敢将领主的公主给休了。这也说明郯国不是鲁国的附庸。

《春秋》载鲁宣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从这一记述中我们也可得知,郯并非是鲁的附庸。这时郯和邻国莒之间有矛盾,鲁和齐两大诸侯出面进行调停。如果郯是鲁的附庸,小小的莒国敢于向鲁叫板吗?同样,如果郯是鲁的附庸,和莒之间发生了矛盾,鲁需要请齐来出面帮助解决吗?所以从这一例子中我们应该知道郯并非是鲁的附庸。而在这次调停中,因为莒国不肯接受调停,受到了鲁的打击。

《郯城县志》认为郯国为鲁国的附庸,理由是郯国方圆不满五十里,所以是鲁的附庸。这里的郯国“方圆不足五十里”是指郯国建国初期就是如此规模还是指到了后期被蚕食的不足五十里。如是建国初期即不满五十里,显然和历史事实不符合。如是附庸何来“子”的爵号。此外如是附庸,其土地面积方圆不到五十里,以今天郯城为中心不到五十里,连云港海州一带也划不到郯国的范围内,记述连云港历史也就没有必要提到郯国这一概念。实际上,郯本身是子爵,其势力范围东到海州一带,这之间的距离远远超出了附庸的规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郯也不可能是附庸。

最后,《春秋》鲁襄公七年“郯子来朝,始朝公”,既然是“始朝公”,则说明郯之前和鲁的关系并不密切。也就不可能是附庸关系。

《春秋》通篇中并未提到鲁国对郯的吞并。郯国之后也是到了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14年)被越国灭亡,而非亡于鲁。

既然郯不是鲁的附庸,那么“鲁之东境”只能是另一种解释:鲁国国境以东地区,而不是说鲁国本身的东部。

因而在追溯海州历史起源时,为准确起见,建议或者继续模糊写为“春秋时为鲁之东境”,或者明确写为“春秋时为郯国地”。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西石岛上有渔家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七

伏广喜 闫祥富



清《云台山志》西石村图

“多少渔人泛钓槎，鲈乡风雨即为家，惯养妇女谈潮信，惟见儿童戏水涯。晨起炊烟烧荻草，晚归满市卖鱼虾。坐看海上成村落，网晒船头落日斜。”

这是晚清诗人张百川的《西墅》。他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典型的临海渔乡风情画面，渔民、渔村、渔船、渔网、渔市、潮信、落日等关键词无一遗漏。

西墅，这个北云台山西北隅的半岛小村庄，的确为一个古老的渔村，过去渔业为各家各户主要生活来源。该村即明清时云台十八村中的西石村。当时惯称西石岛，又有西市、西墅、西墅口等别称。在地方旧志书中也不乏对该村的记载。“西石村，即西墅，去石城村西北7里。”（清《云台山志》）“西石村，一名西墅。”（清《云台新志》）“西石村，在墟沟西北9里，名西墅口。三面环海，东通陆路。居民百户，半在岭上，半在山下。以取鱼为业。”（清《云台补遗》）。

从地图上看，这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岛上小村子，就像一只安详的鸽子，徜徉于黄海岸边。它看似不起眼，但长期以来却在连云地区捕捞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从一些旧的统计资料上可以看到，1935年，连云地区有渔村20多个，其时的西墅与海头、西连岛、高公岛为四大重点渔村；从业户1248户，西墅村达到200余户；全地区有渔行20多家，西墅拥有3家。具体为同兴祥、公义恒、公义兴；地区年渔业总产值9万元，西墅村贡



献了1万元。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墅的海洋捕捞业在连云地区依然是佼佼者。据《连云区志》载,其时该村已拥有大小渔船134艘,在地区村一级捕捞集团中位居第二。

旧时的西石村,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可以说,渔家人走出小院就可以取到他们想要鱼虾蟹贝。打旋网、拉兜子、扳大罾、挑小罾、放小簖、拾矮网、推虾皮、踩河豚、掏望潮、捉蟹子、撩鳗鱼、钓乌贼等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张树庄先生《碧海青螺西墅村》一文就向我们立体地展现了西墅人捕鱼捉蟹的一个生动画面:“前湾的泥滩落潮后,一马平川,是拾海的好去处,但是泥滩太软,人不能立。聪明的西墅人发明了一种工具叫做踏潮板。它前头稍翘,类似雪橇,放在泥滩上,人的一条腿就当作桨和舵,向前推进,把握方向。运行起来,既简单又灵活,且速度很快,是飞驰在泥滩上的一种理想的交通工具。这时的泥滩,充满生趣:蟹张牙舞爪,八带鱼在洞里瞪着眼,滩虎鱼在泥滩上蹦跳,泥螺在成群结队地大聚会……渔家人在不经意间满载而归。”

不过,渔家人大宗的收入靠深海捕捞。早期,西石村就拥有五桅的大渔船,俗称黄花船。这次我们在院前走访,有幸见到了十几岁就在海上飘泊,后又成为船老大现已81岁的汪洪志大伯。据汪老介绍,该船为木船,以帆、橹作动力,可载货50多吨,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渔船。一只船一般配10多个船工,大多往返于吕泗港、济州岛一带。有时还到日本长崎。每次往返时间都需一两个月,主要捕捞大小黄鱼、带鱼、鳓鱼、马鲛鱼等鱼种。据汪老回忆,在他担任船老大后,一次在吕泗港,一拖网就收获黄鱼1万多斤。

旧时的西石村,为一较为发达的渔业集散地。这在地方旧志书上也有所反映。如顾乾的《云台山志》就称此为“商贾辐辏之地。”清代张才甫的《云台补遗》则说:“往来船舶,多泊于此。”此时,我才悟出那两句略带贬义的古海州民谚的真正含义。其一:“西墅朋友论阵子。”其二:“臭鱼烂虾,西墅老家。”试想,作为大宗水产品交易,大多在渔船进港之后,没等船停稳,便被那些捷足先登的鱼商或鱼贩子抢购一空。正所谓来时一阵风,去时无踪影。这说明,来西墅的朋友不正是“论阵子”?而作为渔产品集散地,每日那浓烈的鱼虾味正说明此处每日渔船停

靠数量之多,交易量之大。

西石村,虽海产资源丰富,渔业发达,但渔家人依然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原因在官府盘剥,兵匪掠夺,渔商垄断和难以预料的气象灾害。明张峰的《海州志》就对当时渔民生存状况作了客观真实的记载:“墟沟营每岁三四月间,鱼虾至者积如山阜,然其操网罟以制赢余者,皆客贾商也,而民亦因以为(获小)利。己丑岁(明嘉靖九年,公元1529),贪恶武官无故至墟沟营,掠渔舟以充操备,威劫渔户,至交争于海岛中。一月之内,狂风屡作,而渔人失业,谓感应之理果无哉?”其时的海州进士、诗人潘琪一首题为《西石村》的诗,也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当时西石村概貌:“竹暗鱼腥海市凉,瘴烟蜃气野城荒。连山古戍人家少,蚌壳成堆乱补墙。”

进入新中国后的西墅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他们既有法定的海洋捕捞与经营权,又可自主决定经营方式与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海捕技术的不断优化,大海源源不断地向他们奉献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其中上世纪90年代村里3对拖网渔轮,年水产品捕获量达到1500吨上下,较之解放初一对人工作业的木船,根本无法比较。众多的市民可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那七八年时间里,西墅村中心道路两侧,每天中午和晚上,停靠着众多的客车和轿车,那是省内外慕名而来的食客。他们来吃什么?吃海鲜。这是精明的西墅人为实现海产品二次、三次增值而推出的经营项目之一。在那条长长主干道两侧,诞生海鲜全席餐饮店将近20家。他们自备食材,自聘厨师,以新鲜、多样、价实、口感好赢得市场,在市内外引起一片叫好声。据汪洪志老人介绍,当时,那些海鲜店每天接待顾客都有十几二十桌。有了这些源源不断的食客,他们还愁腰包鼓不起来吗?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日渐枯竭,西墅人大踏步地进行经济转型,变单一“吃海”为“吃养”并举。从那“全国紫菜第一村”的名号就可知道今日西墅人的创业步子迈得多么坚实,仅此一项,就为村里增收超亿元。

2006年,连云新城在西墅破土动工,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西墅人整体搬迁。过惯了渔家生活的西墅人有诸多不舍。但在小家与大家面前,他们选



择后者。时间不长,三千余西墅人住进了豪华、气派而舒适的新家园——西墅花园,融入东部城区都市圈,开启了他们全新的生活。

“前湾泥来后湾沙,当中半岛是我家。”这句俗语形象地道出旧西石村的地理特征。“前湾泥”即前面介绍的泥滩,这“后湾沙”即岛北那一片黄金沙滩。它平整而松软,从山脚下一直向大海延伸。大大小小被海水冲刷得光滑如珠的鹅卵石遍地皆是。20世纪末,这里就建起了后沙湾海滨浴场,为连云港7大海滨浴场之一。每当夏日,那湛蓝的海水,一望无际的沙滩,五颜六色的太阳伞,欢乐的游客,构成一幅迷人的海滨画卷。浴场附近,分布着佛星岩、拇指岩、观潮石、望海台等自然景观。

后沙湾海滨浴场对面为竹岛,亦归旧西石村。其海拔57米,海岸线长1366米,面积13公顷。因岛上多竹,故名竹岛。其为海上难得的一片绿洲,远看起伏流翠,近观茂林修竹,真如银海碧浪中一只玉琢青螺。该岛东、南、北三面陡峭,只西侧为缓滩,然地势平坦,土层较厚,多为粗骨棕壤土,为腹蛇的天堂。海边石头上长有大量的海蛎,古来就是敲蛎人经常光顾的地方。竹岛中部,有一人工岩洞,贯穿该岛南北,长约100米。洞内凉风习习,清泉汨汨。穿行洞内,既可获得一份野趣,又可观到与别处不一样的海上风光。

“前临大海,落潮时壁立万仞,令人惊骇。两旁奇石万状,海水冲去,形如蜂窝,故玲珑可爱。”这是清人张才甫在他的《云台补遗》中记录的后大门景观。后大门,位于西墅东北固山的北坡,为北固山一座山头的名字,俗称棺材山,又称玉枕山。入山口,可见一座拱形大门,两边镌有一副楹联:“山景海景景诗画景,故乡他乡乡花果乡。”进园门即可见登天梯。其峭壁陡峻,石栈层累。道旁有迎客松、石蟾蜍。再往前走,为玉枕山东山头。这里有一条很宽的豁口,东边有馒头石、象石。西边为玉枕山东壁,壁立如削。这里,既可欣赏奇特的钓金龟石景,还可一览龟嘴棚、牛角石、八戒石等大自然为我们创造的惟妙惟肖的造型。山腰间,有一条长约200米的石缝,由北向南,缠绕山腰间,人称“长龙绕山”。在这座山岩上,留有清海州人黄道传的石刻,时间是清光绪己亥(公元1899年)。石刻约130字。其文题为“云水荡胸”,体隶。

西石村风景够多、够美,而能够列入明顾乾法

眼却是这里的晚霞,他将其命名曰“西墅晚霞”从他的《云台三十六景》中可看到这一景观的大概面貌:“西石村即西墅……每遇晚晴,红霞照耀,掩映人家,真堪夺目。”时人卢桂有诗赞曰:“斜阳消残雨,红霞映晚村。画图开碧落,锦绮照衡门。近水沉千缕,遥山点一痕。随风还五色,恍惚梦昆仑。”其景看来真是够美的。

今日西墅,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即西墅之“墅”的读音问题。在现代汉语中,标准读音为shù(音树)。但是,在我们连云港,这个“墅”与“西”字组成“西墅”词条时,读shì就大错特错了。那在连云港读什么呢?读shì(音市)。它因何而起?笔者认为,还是因“市”。西石、西墅,作为正式地名,最早出现于明《隆庆海州志》上,而且是并列出现的:“西石村即西墅。”这似乎与读音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笔者最近翻阅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海防”栏中,发现好几处“西市”二字。它是替代西石、西墅两个地名而出现的。那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西市”之名早已有之。具体出现时间当在“西墅”前,“西石”后。只是在明代没有正式记入地方志乘,而以民间流传为主。怎么理解呢?前面已经提到,明代西石村已是云台山区海产品重要的交易之地。因而人们在称呼上改西石为西市,字变音未变(只将声调由第二声变为第四声)。这样,后者较之前者更加贴切。大概是官府或者是一些文人认为“西市”二字有点不太吉利,于是改为西墅。墅,别墅也。西墅,便引伸为西式楼房。只是,字改过来了,但读音老百姓却始终不认账。因而,直到清道光前,西墅名还是不能成为村名,而为西石村的别名。民国前后,“西墅”终于“夺正”。但老百姓读“墅”为“市”已约定成俗好几百年,谁也不能强行把它变过来。

责任编辑 邱仕明



东磊半块残碑谜团

刘洪雨

在云台山景区云台办事处东磊小学校园内,放着一块残碑,是整个碑的左半部分,落款完好无损,清晰可辨。残存的碑文部分可识读成句。碑额部分是精雕细刻的图案,一只栩栩如生的仙鹤在云朵中展翅飞翔,中间勉强可辨出“碑记”二字。这块碑平时默默地躺在校园一角无人问津,可这块残碑的来历却是历经曲折,若要再探寻和该碑有关的人和事则更是不同凡响。

2012年9月,一场暴雨过后,在东磊小学对面的田埂边出现一块残碑。据发现者顾国铭介绍,他寻访此碑已有三十多年,该碑原立在延福观东北侧三圣庵处,那里原先有个碑林,有将近三十块碑刻,依稀记得该碑部分刻文,好像和明末太监陈增有关。后来三圣庵被毁,所有石碑被运走修建水库拦水坝,工程完工后,剩余半块石碑被遗弃在水库边无人问津,后来被人弄走做了桥板,再后来下落不明。几十年来,顾国铭老人四处查寻这块残碑的下落,却始终没有如愿,没想到这次受暴雨的冲刷,残碑终于在稻田的水沟边出现。

经过清洗、拓片,碑上残留的文字可以部分识读。大意是碑的主人看好延福观附近一处地方,叮嘱后人在他去世后作为他的埋骨之处。后人不敢有不同意见,遵从了他的意愿。该碑由葛维恒篆额,夏曰瑚撰铭,张一元书丹。时间是崇祯甲戌年孟冬,即崇祯七年(1634)农历十月。说起这三人的身份可不是平庸之辈,而是当时出类拔萃的地方名士。

葛维恒(1592—1657),字应宸,沭阳人。人们称其少有大志,聪颖好学,过目成诵。明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进士,联考第一,授成都推官。在成都期间,尽管杂务繁忙,仍能驾驭自如,从无积案,故号称“能吏”。后被众人举荐,转任重庆。上任以后,经常深夜研读案卷,力争做到公正严明,量刑准确,并平反了众多冤案。上司器重葛维恒的才干,经常让他参与重要政务或案件的筹划和处理,下属州县有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也让葛维恒去审理。每次葛维恒都能明察秋毫,公正决断,让各方心服口服。

葛维恒为官重庆清廉如水,执法如山,处理案件不受私情干扰,不为强势屈服。其所得赏赐,分文不取,皆充军需。故重庆官民交口称颂,声名远播。葛维恒因政绩卓著,升任水部主政,不久,被举荐主政江西吉水县。上任3个月,父亲去世,告归乡里服丧。途中,葛维恒乘船被叛军拦截,士兵搜查随行物品,唯有图书与几件旧衣而已,无奈离去。

葛维恒归乡为父亲服丧期间,母亲接着去世,至此不再为官。平时赋闲乡里,浏览诗书,教诲诸生,将平生诗文编辑成《燕贻堂文集》,印刷发行。因葛维恒德高望重,他居乡期间,地方官员有疑难政事找他咨询,四方名士经常登门拜访,以和葛维恒同吃同住攀谈为荣幸。顺治十四年(1657),葛维恒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张一元,字太初,生卒年不详,海州人,万历四



十六年(1618)岁贡生,官至江西抚州府金事。曾有《登云台山》诗一首:

为爱仙台好,终朝访白云。
树高蝉语响,风急鸟声闻。
路引荒藤人,泉流曲涧分。
同游无俗伴,猿鹤自成群。

为该碑撰铭的夏曰瑚更是名噪一时。夏曰瑚(1602-1637),字肤公,号涂山,明淮安府山阳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明崇祯四年(1631)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故居在今淮安楚州区河下镇估衣街仓桥巷。

夏曰瑚少年时即以文章出众而享誉诸生。一次外出晚归,路遇山阳县知县孙肇兴。这是一位被后人称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教育家,当时孙的随从见他犯禁夜行,将他抓来见知县大人。可夏曰瑚立而不跪,告知因为与文友聚会才迟归,并呈上当晚所作文章的草稿为证。孙知县接过文章没看几行即赞叹不已,并说以这样文章去应试考取功名,如拾取草芥般轻松。孙肇兴接着问他的住处,得知就在附近不远,于是索性随夏曰瑚回家,反复为他指点写文章的要领,并亲笔将夏曰瑚文章中的要点修改完毕方才离去。

天启七年(1627)秋,夏曰瑚与好友赵士春一同进京会试。此时孙肇兴恰好是夏曰瑚的监考官。孙肇兴欲竭力推荐夏曰瑚,便将夏取中头卷,后又见到赵士春的考卷,觉得二人的水平不相上下,想再推敲一下再行定夺。这时,主考官有不同意见,认为孙肇兴有庇护夏曰瑚之嫌,结果这一年,夏、赵二人都没考中。崇祯四年(1631),夏曰瑚再次赴试,终于取得优异成绩,以第三名及第,得中探花,留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

由于夏曰瑚学识渊博,文采深厚,且忠于职守,故深得皇帝宠爱,为表彰夏曰瑚功绩,明思宗朱由检于崇祯七年九月(1634)对夏曰瑚亲属给予诰封,封夏曰瑚父亲夏德为文林郎,生母聂氏为“太孺人”,嫡母景氏及其妻黄氏为“孺人”。诰封中并对夏曰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器姿弘达,蕴藉深醇,专经之名,冠绝乡国。”

夏曰瑚以他的人品和才华在京城和家乡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他与东磊的渊源则是因延福观而起。延福观前身为观音殿,天启六年(1626),高晋

卿等督理重修,并获得敕封为“护国延福观”,自此延福观成为一处鼎盛的道教活动中心。夏曰瑚为此题一幅对联来称颂高晋卿等人的功绩:“海上蓬瀛,此为一座;山中宰相,今得三公。”另据《顺治海州志》记载,明末京城有个宦官叫赵真极,河北省安平县人,游玩东海时,选择在延福观永久居住,同时竭力修建延福观,制定清规严律,并在延福观中收藏大量典籍,致使延福观的人文气息空前繁荣,即使州官对赵真极也以上宾对待。或许夏曰瑚与赵真极交往深厚,故作诗相赠赵真极:

东望扶桑咫尺间,韶瑯创造景方全。
四时岚影飞晴雨,万里风帆破晓烟。
月上山头悬宝镜,日升海底捧金盘。
盛朝洪喜真无极,别是仙家一洞天。

根据东磊残碑上可见的文字记载,夏曰瑚于崇祯七年(1634)秋天,奉命由北京经淮安去湖广册封藩王,遇到“磐石齐公”,因为夏曰瑚与“东海三楚君”为旧时好友,便吩咐夏曰瑚为碑的主人撰铭,于是夏曰瑚撰铭曰:“弗雕弗琢,中则有乐。维积不訾,玄之为白。运北图南,□□□□。万物无□,天地□玄。”

夏曰瑚自湖广返回北京后,正当受到重用之时,却因患病而回家休养,并在东湖之滨建了一处恢台园。因相邻之处有多处园林,且溪流环绕其间,故又名“绕来园”。园中搭建花棚,堆砌乱石假山,种植了很多高大的柳树,另有溪水亭台,曲径通幽,环境极为优美雅致。夏曰瑚每日与亲朋故旧在园中饮酒赋诗,从不过问家人生产与生活。他对这段时期的生活状态极为满意,即兴作诗一首:

傍水成幽筑,诛茅得草堂。
所期垂钓处,俨似浣花庄。
杨柳月初上,薜萝风正凉。
何能谢纓冕,读易濯沧浪。

只可惜天妒英才,如此的闲情逸致夏曰瑚并没有享受多久。崇祯十年(1637)会试,夏曰瑚赴京城担任监考官,刚开考不久,突然患上恶性痢疾。当赵士春等同窗好友前往探视时,夏曰瑚已口不能言,后竟卒于考场,享年36岁。

葛维恒、张一元、夏曰瑚三人都是享誉一时的地方名士。他们联手为某人树碑立传,说明该人肯定具有不一般的身份。那么该碑的主人究竟是谁



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文献记载找到答案。

民国二十三年(1934)时任灌云县县志局采访专员的许绍蘧编撰《连云一瞥》，书中有数篇游记，其在东磊部分有一段叙述：“东磊三圣庵侧，有明太监陈增墓，四围铜石已圯。墓前之碑，为沐阳太守葛维恒撰文。”另在许绍蘧之前的民国九年(1920)，吴铁秋先生在《苍梧片影》中说的更为详细：“东磊有一久湮没的轶事，就是明朝太监陈增的古墓，这事可补海州志和《云台新志》的缺略。”他还引用其先师王子扬先生的《建陵山房诗钞》所言：“(陈增)晚节乃退老郁州，留葬东磊，增之幸？岂兹山之幸欤？予尝一过其墓，丰碑岿然，四周皆铜以石。撰文为某太史，篆额则吾乡葛维垣太守也。”以上所记，可证之前顾国铭先生所言非虚，这块残碑应是明万历年间太监陈增的墓碑。

陈增，新安(今安徽)古溪人，是万历年间的御马监太监，在万历年间横行各地导致民怨沸腾的矿监税使中，陈增是排在首位的骄横者。陈增以钦差身份提督山东、徐州等处地方矿税，并兼理盐法、查沿江南河道船科内承库务，被朝廷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到山东以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凡有地方官员对他所作所为有异议者，不是被削职查办，就是停发薪俸，甚至投入大牢受尽折磨。陈增还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数百人死在矿中。他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收入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但由于陈增表面上是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且又是万历皇帝的红人，因而陈增不仅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陈增贪得无厌的本性以及民众敲骨吸髓的种种恶行，激起了凤阳巡抚李三才的义愤。在经过数次上书弹劾无果的情况下，李三才先用计剪除陈增的一些党羽，然后利用陈增与得力同党程守训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诱使陈增亲自上书列举程守训的罪行，以致程守训被捕送京城处死。程守训死后，陈增的其他爪牙收敛许多，结果上交的钱财越来越少，万历皇帝这才开始怀疑陈增有私吞财宝的行为，经常严厉的责备陈增，使得陈增整天在惶惶不安中度过。李三才见时机已到，便编造一些虚假的消息，说什么皇帝已经发觉陈增的贪污行为，批准了大臣们的奏折，派出调查的人员

已经出了京城。陈增听到这些消息，吓得精神彻底崩溃，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上吊自杀。

陈增之死在明代的一些文献中记载的相当详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诈死埋名逃到东海一隅的云台山安度晚年，并得以在东磊寿终正寝，而且会有地方名士为他的墓碑题额撰铭。那么，陈增为什么会选择云台山作为他隐居之地呢？原来陈增在任山东矿监税使期间，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曾经到过海州云台山。当时正值无相禅师谢淳毁家重建三元宫完工之时，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三元宫，以及这里鼎盛的香火，陈增不禁感慨如此三元神宇竟然没有得到皇帝的敕封。于是，他利用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请求敕封云台山三元宫。万历三十年(1602)明神宗颁赐云台山三官庙《大藏经》一部，由陈增带着敕封三元宫的圣旨并护送《大藏经》再次上了云台山。尽管此事有多重因素促成，但陈增的努力不可忽视，他对云台山三元宫的名声传播也算尽了一份力，应当算当上有功之臣。陈增借此机会与三元宫的僧人建立深厚的交情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说云台山当时属于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海岛，与陆地之间来往不便，信息闭塞，因此，陈增将云台山作为亡命隐居之地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关于陈增逃到云台山以后的生活状况，海州的《云台山志》《云台新志》等历代志书并没有明确记载。究其原因，是因为陈增利用手中特权，贪赃枉法，中饱私囊，鱼肉百姓，而至恶名昭著，正如王子杨老先生所说，人们是怕陈增的恶名玷污云台山的声誉，故意将他的形迹从云台山中削除。

复见天日的残碑和一个声名狼藉的太监联系在一起，多少让人有些不知所以，还有如此出类拔萃的地方名士联袂为他树碑立传实在是令人费解。难道是前人所述有误，还是另有隐情？也许只有见到另半截残碑的碑文才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作者通联：海州幸福路20号连汽出租公司)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兴国禅寺

胡维仁



上图为兴国禅寺门额石刻, 下图为该寺原貌示意图

在朝阳街道的狮子山下, 与孝妇祠同一院内, 有一座兴国禅寺, 它是 1995 年移址重建的。兴国禅寺的原址在今朝阳办事处西南 300 米处, 曾是新县小学旧址。1909 年(清宣统元年), 朝廷废科举, 办学校。新县老贡生张百川为了替家乡培养人才, 在兴国寺里办起了蔚云学堂, 民国后改为灌云县第三高等小学。那时庙里菩萨、和尚都在, 孩子的学习和佛教活动同时存在。直到“五四”运动以后, 菩萨才被毁掉, 和尚才全部离开, 这里才完全变为一所小学。就是后来的新县小学, 校园内庙宇的格局直到解放初期还保存着。

1988 年 1 月, 连云港市云台区政府下文, 把兴国寺原址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兴国禅寺历史久远, 据《隆庆海州志》记载: “唐元和中建, 唐末兵废, 宋元祐二年重建, 十四年, 僧宗显重修。”乾隆三十七年问世的《云台山志》只记“兴国寺在新县中, 相传为东海县治。”道光十一年问世的《云台新志》引《大清一统志》称兴国寺“在海州东北, 巨平山北, 唐元和中建。”“唐元和”距今已有 1200 多年。

兴国禅寺, 群众一直称之为“大寺”。庙院从南到北约 200 多米, 东西亦有 100 多米。前后三进院落, 前院虽无建筑, 却花木茂盛。大门向南, 前有五级台阶。中院门为山门, 额镶一石, 上刻“兴国禅寺”四字, 下款“乾隆”二字可辨。门顶虽不大, 却前后两檐, 全部青瓦苫顶, 门前亦有四级台阶。山门里东西厢房各五间, 正面为大雄宝殿, 雄伟高大, 亮脊亮山, 飞檐斗拱, 四梁八柱, 木椽砖望, 前墙中敞, 八扇屏风隔开内外。殿中有神台、神龛, 龛中有佛像。殿前亦有五级台阶: 台阶左右各一莲座石雕, 一米见方, 厚约 50 公分。座上各有一铁铸花瓶, 高约一米五, 瓶颈有耳, 瓶体上有诸多龙纹。台阶前为一香池。殿前东西各有一花坛, 坛中各长一棵古柏, 围皆合抱, 冠掩殿脊。殿两旁东西院墙中各有一八角门, 门额镶石刻“不二法门”等字, 进门可入后院。殿外东西山墙对面, 各有普通房屋三间。大殿后檐东西亦有花坛, 坛中各有一棵梧桐, 枝繁叶茂, 皆百年古树。大殿亮脊正中, 砖雕莲花座上有一铜葫芦, 高约 50 公分, 葫芦肚径也在 40 公分以上, 此乃珍贵之物。每遇狂风即呜呜作响, 更奇怪的是风越吹, 葫芦体表越亮, 通体金光闪闪, 耀人眼目, 群众说是“风磨铜”做的。后院开阔, 几与前院中院同大。院中



一大花坛,坛中一株大银杏树,树围四人合抱,高约40米,冠盖遮天。盛夏,其树荫几乎遮盖大半个后院,古庙显得阴森神秘。秋深叶落,叶深尺余,满院堆金。银杏树西为六间西厢,银杏树北为五间后殿,银杏树东是一道院墙,院墙内是一排杂树,刺槐、杨柳相互枝连叶接,高矮不等,粗细各异。墙外还有一大广场,东、南、北三面皆为刺槐所围。寺庙院后有二株古朴,俗称格木,根系外露,龙盘虬曲,节错难分。干粗皆三人合抱,枝繁叶茂,冠遮天日。树根下有石碑,一人高,前后龙蛇莫辨,可见时代久远。老人相传此碑系古“和椎”——葬和尚处,年久自难寻觅。这座古庙规模宏大,而影响、声望更大。庙里面菩萨多,僧人亦多,远近闻名。海、赣、沐、灌、苏北各地来敬香者不断。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日本高僧圆仁法师也曾来过这里。圆仁(公元793—864年),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第三代座主,俗姓壬升氏,北海道枋木县人,15岁出家,师从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学法,这最澄是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道邃行满法师的得意门生,回日本后创日本天台宗。最澄圆寂,圆仁专修苦行,决心来中国精读《法华经》,精研佛理,深探禅意。日本承和五年,也就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要来中国,圆仁申请随行,实现登天台山读《法华经》的愿望。于六月十三日登船,七月一日才进长江口。在海陵县的东梁丰村下船登岸。留学僧一行先后拜国清寺、开元寺,后去如皋,一路礼佛、参学到扬州。

第二年,圆仁一行入天台山,燃灯供佛,奠祭师影。三月北上,经高邮、山阳、涟水,月底向海州。船于高公岛登岸,祀天神地祇。后至宿城新罗人(韩国)宅休息,遂与新罗僧庆元、惠益同见村长老王良。4月6日到新县城里兴国禅寺。寺里僧众见外国僧人拜访,人人高兴,忙着煎茶招待。圆仁一行虽雇人挑行李,又骑小驴,可翻山越岭少不了步行,到新县,确也不易。大家在兴国寺休息,饮茶,喂驴,前后参观,膜拜诸神。后在新县城里又雇三头毛驴,离兴国寺往西去大村。

日本高僧圆仁来兴国禅寺,时间虽短,可毕竟是国际间的一次宗教文化交流活动。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有专门的记载,这在国际佛教活动史上也是有意义的一笔。

兴国禅寺时毁时修,民国初还是完好的,民国间虽然改为新县小学,内部无佛无僧,“兴国禅寺”门额石刻仍留在门上。就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本鬼子攻打小刀会放的一把大火,也没有烧尽,还留下三间大殿,两间后殿,那一棵银杏树始终昂立天井,显示兴国寺的古老与坚强。被日本人烧毁的房子,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伪警大队长朱宝松捐资将后院6间西屋修复。抗战胜利,连云市教育科虽多次拨款,可被日本鬼子烧毁的房子还没有全部修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海连市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才将兴国禅寺前后院的房子全部修好作为教室。随着教育发展的需要,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又多次拨款,在前院的空地上又建了许多房屋。

“文革”中,大殿作为“四旧”拆除,改建平房,脊顶那风磨铜葫芦也作废铜卖给废旧物品收购站。后院的千年银杏树也在1973年砍伐,木材做成了朝阳大会堂的坐椅。庙院后的两棵古朴,五十年代初被伐一棵,余下的一棵在“文革”中亦被伐掉。古老的兴国禅寺除一块门额石刻、“不二法门”石刻、“客堂”石刻和一座高僧舍利塔外,别的已荡然无存。1985年4月10日,新县小学西迁,兴国禅寺后院是信用社,中院是镇中心幼儿园,前院是镇防保所,又逐步建成民居或商业用房,东临朝阳路,一片繁华景象。原兴国禅寺门额等石刻也在房屋改造时被拆下,几经辗转,现存放在新建的兴国寺内。

1995年底,根据党的宗教政策和广大民众的愿望,经市宗教局、云台区人民政府批准,兴国禅寺在狮子山下孝妇祠旧址重建。

新建的兴国寺,占地约20亩,主要建筑物为:1999年初开始建的山门三间,山门门额是原中国佛协副会长、江苏省佛协会长、镇江焦山定慧寺长茗山长老题写的“兴国寺”石刻;1999年6月开始建的观音殿5间,供奉着菩萨和佛的塑像;2003年10月开始建的大雄宝殿5间,供奉着三世佛、海岛观音及十八罗汉塑像;1997年6月开始建的众神殿5间;2005年开始建的寮房三层共27间,供僧人休息及接待外客用。

(作者通联:开发区朝阳街 道尹宋村2-44号)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话说煎饼

葛永明



赣榆煎饼

煎饼,是赣榆民间的主食,也是赣榆土产之一。赣榆人只要有了煎饼,就不怕饿肚子了。煎饼美味可口,便于携带储存,因此又是赣榆人外出首选的自带食品和馈赠亲友的上乘礼品。

煎饼,发源于山东沂蒙山区,盛行于鲁南、鲁中、鲁西及苏北一带。赣榆地处苏鲁交界,历史上曾属山东,地理环境上属沂蒙山余脉,民风习俗与齐鲁大致相同,因此也是煎饼的主产区之一。俗话说:“山东山东,煎饼大葱”,当然也就包括赣榆了。

制作煎饼的原料很多,小麦、玉米、高粱、山芋以及现在已不多见的糝子、糜子,但凡能磨出面粉或制成稠糊状的五谷杂粮都能烙出煎饼。如果把这

些杂粮掺在一起,烙出的煎饼味道更香,营养更丰富。

常吃煎饼,确实有利健康。煎饼口感筋道,食用煎饼需较长时间的咀嚼,因而可生津健胃,促进食欲。吃煎饼要有牙劲,能锻炼面部神经,促进面部神经运动,有益于保护视觉、听觉和嗅觉神经的健康,甚至活络全身筋骨,吃一顿煎饼,等于做了一次全身的体育锻炼。有广告词说:“牙好,味口就好!”的确不错,常吃煎饼,牙口就好。赣榆高龄的老人比较多,与长年吃煎饼是分不开的。过去问候老人身体状况怎么样?老人一般回答是:“还行,还能咬动煎饼。”以还能咬动煎饼来证明自己的

身体还算硬朗,这大概也是赣榆人独有的检验自己身体是否健康的最简便的方法吧。

煎饼,吃的方式很多,简单的有,复杂的也有。便宜的有,奢侈的也有。有卷着菜着吃的,也有空口吃的,总之煎饼吃起来很方便。农民下地干活,捎张煎饼,菜园边上顺手拔棵大葱或摘个辣椒,择一择,卷在煎饼里,边走边吃,又饱肚子又省事,尤其是农忙的时候,绝不耽误农活;渔民近海小取,捎几张煎饼,小包袱腰上一拴,饿了,随手捞个小虾小蟹卷在煎饼里,香里透着鲜;上学的、上班的,起晚了买根油条,割块黄粉,卷起来,边走边吃,到校了,到单位了,肚子也吃饱了;过去农村的孩子到县城求学,远



的寄宿、近的走读,哪一个不是捎煎饼,捎咸菜。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赣榆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吃着煎饼学到了知识,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甚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到县里开会,哪怕是最隆重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通知最后一句总是自带干粮,只管茶水。哪怕你是大队书记、乡镇长,脱产的、不脱产的,一律不管饭。中午休会,吃着自带的煎饼,喝着公家的茶水,就是干部待遇了。即使是今天农民工进城干活,大多数还是自带煎饼,一是节约省钱,二是煎饼垫肚子充饥,吃饱了干活有劲。因此有人说,煎饼是世界上最方便实惠的快餐和即食产品,一点也不比麦当劳、肯德基差。所以著名诗人徐明德在《我们赣榆人》中就曾高歌吟唱:“我们享山川之饶,我们受渔盐之利,山珍、海味,百样佳肴,我们都曾尝遍,最香的还是,煎饼卷大葱。”

煎饼产生的历史很悠久,大致可以追溯到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制作煎饼的主要工具是磨和鏊子,在粉碎机、煎饼机产生之前,没有磨和鏊子,是无法烙出煎饼的。

据史籍记载,磨是鲁班发明的。在鲁班发明磨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春捣,既慢又累。鲁班看见母亲每次春麦都累得满头大汗,就琢磨着怎样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成旋转运动,后来就发明了用两块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上下以轴固定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推拉使它转动,把谷物顺槽送入磨成粉状或糊状,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磨就产生了。

再说鏊子。鏊子的出现比磨要早得多。相传远古时期就有了鏊子,但那是石头的。原始部落时期还曾出现过陶制的鏊子,就像今天的大砂锅。夏商周时期的代表物是青铜器,所以那时的鏊子应是青铜铸的,其时鏊子不单是制作食品的工具,还是一种刑具,叫炮烙,殷纣王就曾用这种酷刑诛杀反对自己暴政的大臣失去民心而亡国的。战国时期,铁的出现使鏊子得以大量普及,并一直延用至今。应该说煎饼的发展历程与铁鏊子的出现是分不开的。鏊子,三条腿,腿高约6—7公分,中高边低,形同大龟,极像海中的大鳌,因此音鏊。据传说,渤海中有

一巨大的龟,名鳌,背负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故三足。久慕沂蒙山物华天宝,风景秀丽,某日乘大潮游览沂蒙,兴之所至竟忘归,及潮退,不得回,遂滞山中。今沂蒙山腹地深处,有一天然的石鏊子,三条腿,龟形,面向大海,昂首东望。这大概就是鏊子的原形了。

沂蒙山区的女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母亲就要严教其学烙煎饼,并以烙不好煎饼找不到好婆家相威胁,因为煎饼是家家户户每餐必备的主食,作为家庭主妇,不会烙煎饼,那是一大缺憾,将被认为不会过日子,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那时农村妇女个个都会烙煎饼,真正是家家支鏊子,户户烙煎饼。

煎饼流行于山东大部分地区(唯胶东人不吃煎饼),故有“山东,山东,煎饼大葱”一说。苏北地区的徐州、连云港、宿迁一带因靠近山东,历史上也曾多次归属山东,风俗习惯相近。因此也是煎饼的主产区。福建客家人也吃煎饼,当是两晋、两宋时北人南迁传过去的;东北人也有吃煎饼的,那是明清时山东人闯关东,不但拖儿带女,还带着鏊子。因此,煎饼也传到了东三省。近些年,北京、上海、广东、新疆人也盛行吃煎饼,不外乎也是山东或苏北人北上南下闯世界带去了这一美食。毫不夸张地说:“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鏊子,有鏊子的地方,就有煎饼香。”这里所说的山东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赣榆人了。因为赣榆与山东村庄比邻,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风俗习惯相同,历史上曾多次归属山东,1953年才划回江苏。

煎饼是久负盛名的食品,历史上赞美煎饼的诗词文章和传说典故也很多。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北人此日(指正月初七日这一天)食煎饼,于庭中作之,支薰火,未知所出。”隋代侯白《启颜录》中曾记述北齐高祖大宴群臣时出过一个谜语与众同乐,谜底就是煎饼。

历代赞美煎饼的诗文很多,唯清代大作家、史学家,吃着煎饼长大的山东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煎饼赋》写的最为绘声绘色:“溲含米豆,磨如胶饧,扒须两歧之势,鏊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乃急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



黄白忽变,斯须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热铛,一翻手而覆手,作十百于俄顷,圆于望月,大如铜铤,薄似剡溪之纸,色如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

蒲松龄是文学巨匠,故事大师,不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我国文言文短篇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就连一篇《煎饼赋》都写得如此优美耐读,将制作煎饼的详细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令人读来,如临其境,似有煎饼香味飘来。真不愧是吃着煎饼长大的文学大师也。

煎饼不但好吃,还便于携带,易于贮存,好手烙的煎饼存放个把月都不会发霉变质。吃煎饼有菜行,没菜也行,都能吃饱,是出门在外首选的“干粮”。有专家考证,当年徐福跨海东渡捎带的干粮就是煎饼,想起来,很有道理。徐福是赣榆人,赣榆是煎饼的主产区,徐福也是吃着煎饼长大的,自然知道煎饼的优点。率童男女,五谷百工在苍茫的大海中寻求长生不老药时,捎带煎饼做干粮是最佳选择。煎饼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吃法是卷菜吃,什么菜都能卷,肉、蛋、鱼、虾、大葱、辣椒,十分方便快捷。简单的,复杂的,昂贵的,便宜的菜肴,卷在煎饼里吃都很香。今天日本人的主食快餐三明治,用面包片卷着菜吃,很有可能就是徐福传给他们的。当然这仅是一种猜想,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煎饼是不是徐福带到了日本有待于专家研究考证,可煎饼养育了山东抗日军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却是不争的史实。

纵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而在山东抗日战场,山东抗日军民是吃着煎饼,喝着糊涂,扛着大刀、红樱枪,用步枪和地雷支撑了敌后抗战,并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取得了胜利。八年抗战,山东战场,煎饼做军粮,功莫大焉。

全面抗战之初,中共山东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春,罗荣桓、陈光又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八路军主

力115师东进抗日来到沂蒙山区。沂蒙人民家家支鏊子,户户烙煎饼,用最好的伙食,支援子弟兵。但沂蒙山区本来就很穷,加上日伪顽残酷的“扫荡”封锁,人民生活更加困难,经常是吃上顿没下顿。即使这样,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忍饥受饿,也要省下最后一瓢粮,献出最后一块布支援主力部队。但几万人马集结在贫困的沂蒙山区,吃饭仍是大问题。指战员们最好的伙食就是盼望能吃上一顿真正粮食做的煎饼,可那时就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因为敌人的封锁,加上天灾,后勤供应十分紧张,拿钱都买不到粮食,指战员们几乎天天吃带壳的高粱、糝子掺着地瓜藤、花生壳烙成的煎饼,这样的煎饼卷着吃不好咬,很硬,一咬一摇头,战士们戏称为“摇头饼”,可怜那些长征过来的南方指战员,从小到大哪吃过煎饼,都是捧在手里转圈吃,战士们戏称为“读报纸”,每逢开饭发下煎饼,各种吃相都有。山东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就是吃着这样的煎饼,坚持战斗,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那时,有一副对联,几乎贴遍了根据地的家家户户,上联是:“烙煎饼支援八路”,下联是:“打鬼子保家卫国”,横批是:“全民参战”。1943年11月,八路军滨海军区发动赣榆战役,主力部队集结在城头,吴山一带,根据地老百姓主动为战士们准备干粮,凡是能拿动磨棍的,不分男女老幼都去推磨;只要会烙煎饼的,不论大闺女、小媳妇、大嫂子、老婆婆,都去烙煎饼,鏊子不够用,人歇鏊子不歇。厉庄区郭大娘家娘仨连轴转,一天一夜烙煎饼180斤,被评为拥军模范。一张小小的煎饼,传递的却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作者单位:赣榆区党史县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